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卓越工程 建设期刊

ISSN 3105-5877

人文与社会科学探索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xploration

ISSN 3105-5877



02>

2025
1卷2期



环球未来出版社
Global Future Press

人文与社会科学探索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xploration*

ISSN 3105-5877 月刊

主编：李松有

副主编：张子杰

编委成员：王淳凯 熊晨曦
杜凯伟



GLOBAL FUTURE PRESS

主办 | 环球未来出版社

官网 | www.gfpress.org

邮箱 | gfpress@yeah.net

地址 | 中国香港尖沙咀亚
士厘道 34 号星光行大厦 7
楼 A5 室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历史进程与阶段特征 Historical process & Stage characteristics

汉语泛义动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吴元超、陈春晓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Universal Verbs – WU Yuanchao, CHEN Chunxiao

pp.1 – 5

经典传承与时代呼应 Classic inheritance & Echo of the times

《红旗谱》版本修订研究 — 朱萌萌

A Study on the Revision of Red Flag – ZHU Mengmeng

pp.6 – 18

合同瑕疵与侵权认定 Contract defect &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代理人冒名签订保险合同的法律责任分析 — 偶见、卢洋、周羿所、吴招娣、吴兴生

Analysis on the Legal Liability of Agents Signing Insurance Contracts under Impersonation – OU Jian, LU Yang, ZHOU Yisuo, WU Zhaodi, WU Xingsheng

pp.19 – 24

科技赋能与文化传承 Technology empowerment & Cultural heritage

四川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及对策研究 — 柯贤飞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Sichuan and Countermeasures – KE Xianfei

pp.25 – 34

音色处理与文本诠释 Timbre processing & Text interpretation

张瑞艺术歌曲艺术特征与演唱分析——以《诔词》《苏苏》为例 — 夏艳茨

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Singing of Zhang Rui's Artistic Songs — A Case Study of Pian Ci and Susu — XIA Yanci

pp.35 – 47

私权属性与民事定位 Property of Private Rights & Civil Orientation

白俄罗斯版权制度的法律属性研究：基于民事立法体系的考察 — 张荣燚

A Study on the Legal Attribute of Copyright System in Belaru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ivil Legislation System — ZHANG Rongyi

pp.48 – 53

价值观与响应方向 Values & Response direction

家庭资本如何影响“双减”政策响应 — 郑友刚

How does family capital affect the policy response of "double reduction" – ZHENG Yougang

pp.54 – 59

形式守节与精神自由的取舍 Formal chastity & Choice of spiritual freedom

情之所至，理之所归：《董生与李氏》中的三重变 — 蒯仁君

Where emotion goes, where reason goes: the triple change in Dong Sheng and Li Sh – KUAI

Renjun

pp.60 – 66

汉语泛义动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吴元超¹ 陈春晓²

(1. 泰国商会大学, 泰国 曼谷 10400; 2. 泰中国际管理学院, 泰国 曼谷 10400)

摘要: 泛义动词是汉语动词系统中的特殊成员, 具有语义空泛、搭配灵活、语用功能广泛等特点, 在日常交流中使用频繁, 也给汉语学习者带来了诸多困扰。本文从方言研究、语义与语用研究、偏误分析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四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汉语泛义动词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 总结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并结合当前语言研究的新趋势, 展望未来研究的方向。研究表明, 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一定成果, 但在研究视角、方法整合和理论建构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关键词: 泛义动词; 语义空泛; 搭配能力; 语用功能; 对外汉语教学

引言

泛义动词是指语义较为空泛、不能独立表达具体动作意义, 需依赖与其搭配的成分来具体化其语义的动词, 如“搞”“弄”“走”“打”“来”等。这些动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高, 分布广泛, 具有突出的构式功能和语用价值。然而, 由于其语义的抽象性和搭配的复杂性, 泛义动词也成为汉语学习者在掌握中常见的难点之一。

对泛义动词的系统研究可以深化对汉语动词语义系统的理解, 揭示语言表达的认知规律和语用机制, 对于语言教学、词典编纂、语言智能处理等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

1. 泛义动词的研究方向

研究者对泛义动词的关注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 泛义动词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

1.1 方言研究

方言中的泛义动词现象具有地域性差异和语义分布的特殊性。例如, 山东话中“整”“整治”常被广泛使用, 具有高度的语义延展功能; 四川方言中“搞”“整”的用法亦有独特之处。研究者如李小红 (2015) 在《西南方言中泛义动词“整”的语义及其演变》一文中指出: “方言中泛义动词往往具有更多元的语义和更强的表达能力, 是研究词义演变和语法化的重要窗口。”^[1]

1.2 语义与语用研究

泛义动词的语义特点主要体现在其抽象性与概括性上, 研究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切入, 探讨其构式搭配、语义演化和认知机制。例如, 刘艳红 (2018) 运用框架语义理论分析“搞”字的语义构建机制, 发现其可通过不同搭配进入多个语义框架, 如“组织型”“操作型”“情绪型”等^[2]。

在语用功能方面, 泛义动词常用于委婉表达、模糊陈述、增强语气等。例如“搞个活动”“弄点事情”, 表达模糊但具有情境暗示力。这类动词还能起到缓冲语气、维持会话合作的语用作用。

作者简介: 吴元超 (1997-),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专门用途汉语。

陈春晓 (1997-),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中文+职业教育。

1.3 偏误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中，学习者对泛义动词的掌握情况普遍较差。常见偏误有：

- (1) 用错搭配，如“做作业”误用为“搞作业”；
- (2) 句法结构错误，如将泛义动词误用于不及物结构中；
- (3) 语义不清晰，如泛义动词未能准确传达语境下的特定意义。

偏误原因包括母语负迁移、教材解释不足、教学忽略语用功能等。张磊（2020）“通过分析 HSK 作文语料库发现，“搞”“弄”等词是高频错误词项，且与学生的母语背景有显著相关性”^[3]

1.4 对外汉语教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泛义动词是教学重点也是难点。已有教学研究聚焦于：

- 分级教学设计，逐步引导学习者掌握泛义动词的基本义与引申义；
- 构建典型搭配库，强化学习者对常用搭配的识别与运用；
- 设计任务型活动，提升学习者在语境中使用泛义动词的能力。

如王莹（2019）提出“功能—构式教学法通过具体语境、功能目标来引导泛义动词的教学，提升学习者的实际应用能力。”^[4]

2. 汉语泛义动词研究的主要特征

2.1 研究对象的扩大化

早期学者的研究多聚焦于“搞”“弄”“打”等典型的高频泛义动词，这些动词因其语义空泛、搭配范围广泛而成为分析重点。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将研究对象拓展至“走”“来”“带”“给”“发”等边缘性或具有一定泛义特征的动词。这种对象的扩大不仅丰富了研究的广度，也促进了对泛义动词语义演变机制的进一步认识。^[5]此外，一些研究还尝试从方言视角切入，比较不同区域汉语中泛义动词的使用特点，从而揭示其共性与变异。^[6]

2.2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等新兴研究方法的发展，泛义动词的研究逐渐由传统的描述性分析转向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路径。例如，研究者利用大规模语料库对常见泛义动词进行共现搭配分析和词频统计，借助原型范畴理论和语义网络模型揭示其语义结构和认知机制；也有研究从交际语境出发，探讨泛义动词在实际话语中的语用功能和策略使用。这种方法的融合不仅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验证性，也拓宽了语言现象的解释路径。^[7]

2.3 理论建构的系统化

在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的同时，学界开始关注对泛义动词研究成果的理论整合。从最初个案描写和零散分析，逐步发展为系统性的理论探索。如有学者提出“轻动词语义场模型”，从语义场的角度揭示泛义动词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有研究构建“动词构式语义演化链”，尝试说明泛义动词如何在构式层面实现语义扩展。这些理论建构不仅推动了泛义动词研究的系统化，也为汉语动词系统的整体描写和建模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8]

3.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3.1 研究对象重复，创新性不足

目前关于“搞”“弄”等典型泛义动词的研究数量众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分析体系，但也导致研究内容趋同、视角单一，缺乏新意。相比之下，其他泛义特征明显但使用频率相对较低的动词，如“带”“发”“走”等，关注度仍显不足。此外，随着网络语言的发展，部分新兴词汇或具泛义化倾向的新用法尚未被系统纳入研究视野，制约了研究的广度与前沿性。

3.2 理论与实践脱节

部分研究过于侧重理论探讨，如语义结构分析、构式演化路径等，却缺乏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使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作用有限。

3.3 教学研究偏重“用法讲解”，忽视语用功能

多数教学类研究以词义辨析、搭配训练为主，较少关注泛义动词在真实语境中的语用功能，如模糊表达、语气缓和或会话配合等，使教学内容缺乏交际导向，不利于提高学习者的实际运用能力。

4. 未来研究展望

4.1 加强方言与历时演变研究

泛义动词在不同汉语方言中往往表现出显著的语义差异与使用习惯。未来可在现代汉语研究基础上，深入挖掘各地方言中相关动词的分布特征与功能差异，探索其地域性演化规律。同时，借助历时语料库，从历史文献、旧体文言或白话材料中追溯泛义动词的词义演变路径，揭示汉语动词系统内部的动态演变机制，为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研究提供借鉴。^[8]

4.2 拓展跨语言对比研究

当前关于泛义动词的对比研究仍以中英对比为主，其他语言的涉猎较少。今后可进一步开展中韩、中日、中泰等语言的对比研究，从语义透明度、构式匹配、习得难度等角度探讨泛义动词的共性与差异，揭示其认知动因和语言迁移路径。这将有助于深化对泛义动词的语言本质理解，并为多语背景下的教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4.3 推进语料库与人工智能辅助研究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泛义动词研究可进一步与技术手段融合。通过大规模动态语料库进行搭配统计、搭配倾向建模、典型语境提取，或运用词向量、聚类分析等算法开展语义空间建模与聚类研究。同时，结合AI辅助教学平台，实现泛义动词使用的自动纠错、搭配推荐和个性化语境教学，提升研究的实证性与教学的智能化水平。

4.4 构建泛义动词教学模型

泛义动词因其语义抽象、使用灵活，学习者常出现理解偏差或使用不当。未来教学研究应结合构式语法理论，将典型搭配、语用功能、交际策略纳入教学内容，构建层次分明、语境导向的教学模型。可针对不同语言背景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设计分级教学方案，强化语用意识的培养，从而提升学习者的实际运用能力与交际效率。

5. 结语

泛义动词作为汉语词汇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语义的模糊性、构式的多样性和语用的灵活性，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功能和认知价值。它不仅广泛存在于日常口语交流和书面语篇中，还在语义延伸、语用调节、模糊表达等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泛义动词不仅是汉

语本体研究中不容忽视的语言现象，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构成学习者难以掌握的重点和难点内容。

回顾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围绕泛义动词的语义特征、构式类型、习得偏误及教学策略等方面展开了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积累。^[9]然而，整体来看，目前研究仍存在理论建构不够系统、研究对象较为集中于典型动词如“搞”“弄”等，且教学应用研究相对薄弱等问题，亟需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

未来的研究应跳出单一学科范式，从跨学科视角出发，整合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教育语言学等理论框架，借助人工智能、语言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推动泛义动词研究向精细化、系统化方向迈进。只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才能为汉语词汇系统的深入描写和对外汉语教学的精准设计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应用指导。

参考文献：

- [1] 期刊——李小红. 西南方言中泛义动词“整”的语义及其演变[J]. 方言, 2015(4): 65 - 72.
- [2] 期刊——刘艳红. 泛义动词“搞”的语义框架分析[J]. 语言科学, 2018(3): 112 - 118.
- [3] 期刊——张磊. 汉语学习者泛义动词使用偏误分析——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的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20(2): 80 - 88.
- [4] 期刊——王莹. 泛义动词的功能—构式教学法探索[J].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2019(1): 55 - 61.
- [5] 论文——杨亚楠. 泛义动词“做”、“干”、“搞”、“弄”的比较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 [6] 论文——黄彩玉. 现代汉语泛义动词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03.
- [7] 论文——庞冉冉. 现代汉语泛义动词及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 西北大学, 2019.
- [8] 期刊——王春辉. 泛义动词研究综述[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7(5): 45 - 51.
- [9] 专著——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商务印书馆, 1999.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n General Verbs in Chinese

WU Yuanchao¹, CHEN Chunxiao²

(¹*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Bangkok 10400, Thailand;* ²*Thailand-Chin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Bangkok 10400, Thailand*)

Abstract: General verbs are a special category within the Chinese verb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vague semantics, flexible collocation, and a wide range of pragmatic functions, they are frequently used in daily communication but also pos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learners of Chines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c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Chinese general verb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dialectal research,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t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in light of current trends in language studies, proposes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lthough substanti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here is still ample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method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struction.

Keywords: general verbs; vague semantics; collocational capacity; pragmatic function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CFL)

《红旗谱》版本修订研究

朱萌萌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红旗谱》作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著作,审美与政治结合的特征为作品引来截然不同的两种评论声音,梁斌本人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共修订了4种版本。以梁斌红色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四个不同版本为研究对象,整理归纳版本之间的不同之处,并结合特殊的文学创作背景、作家主观因素和读者评论的声音来归纳版本变化情况。基于此,选取“人物形象改动”“阶级矛盾的强化”“政治话语的修正”三板块,研究文本重构背后的政治影响。修订经典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梁斌对经典的修订有锦上添花,同时也会出现矫枉过正的问题,这是由于时代限制而无法避免的情况,读者应该正视文本修订这一文学现象,并挖掘其中蕴藏的文学价值,对十七年文学作品经典化研究进行再思考。

关键词:梁斌;《红旗谱》;版本修订;政治书写

一、《红旗谱》的版本变迁

(一) 多版本政治书写比较相关问题说明

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政治与文学始终纠缠在一起,无法孤立看待。因此,文学作品与政治紧密联系,在研究文学作品时,我们需要联系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状况。政治书写¹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只要与现实政治生活有联系的一切文字性产物,包括文学性作品、政治性文献、纪实性著作都可以称之为“政治书写”。

本文对《红旗谱》四个版本的比较与分析制定了规则,笔者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本视为唯一的“固定参照系”,采用文本对比的方法与其他三个版本的标点符号、字词、语句等方面进行比较,并整理分类。以此更能厘清各个年代不同版本之间的变化,为本文研究提供扎实有力的语料基础。

但由于梁斌从未对多版本政治书写的性质做过明确回应与解释,笔者只能根据版本之间变动话语的性质和对读者阅读文本产生的影响,尝试去做一些分类。经过分析总结,发现各版本之间的修订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阶级矛盾、政治话语之上,故此,本文主要针对各版本修订中最为醒目的政治类修改,而其他为了字词使用规范化的修改则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1. 字词使用规范化修改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本中,梁斌经常借引号代替书名号,在1969年版中此类现象并无修改。直到1966年版和1978年版中,将代替书名号的引号一律改正为书名号。如贾湘农向江涛推荐“社会科学讲义”‘毁灭’,改为《社会主义科学讲义》《毁灭》。随着我国对于汉语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逐步规范,对字词的使用进行了修改。例如在1957年版中“气势凶凶”在1966年后都修订为了“气势汹汹”、“年青”修订为“年轻”、“咱晚”修订为“早晚”。梁斌为了文章字词表述更为准确恰当,对于部分字词进行同义替换。如“念叨”

作者简介:朱萌萌(2002-),女,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¹ 张东旭在《论当代河南小说中的政治书写现象》论文中提到,政治书写是指写作主体通过文学的方式关注国家政策、社会事件、历史人物的写作行为,作者通过记录、反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还包括作家们关注社会、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心态。参见张东旭.论当代河南小说中的政治书写现象[J].中州学刊,2020(08):153-158.

修订为“说”、“村乡”修订为“乡村”、“战栗”修订为“颤栗”。此外，部分方言土语被现代汉语替代。如“脸蛋子”修订为“脸庞”、“黄屁股鸡”修订为“穷光蛋”、“铺盖卷”修订为“行李”。此类修改是出于规范性和审美的需要，尚不构成修订现象。

2. 政治类修改

金宏宇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中提到“多数的修改本虽然也有艺术改进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内容性的修改，往往是小说越来越迎合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6]，涉及到以上的修改方向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

支永碧认为政治话语的修改有五个基本特征：

- (1)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 (2) 具有明确的参与者与参与政治主体；
- (3) 具有多样的体裁形式和特定结构要素；
- (4) 具有权利工具性；
- (5) 具有时代性和社会公共性。^[7]

故此，就《红旗谱》而言，其文学修订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便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主要围绕着政治人物、政治话语等方面修订，这也是本文进行多版本修订对比研究的对象。

由于作家本人对于文本内容的设计和审美需要、特定时代政治要求对创作者文艺创作的规范等原因，修改文本内容在“十七年文学”期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例如《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等耳熟能详的作品。就《红旗谱》而言，这部作品的版本分布和演变颇为复杂，每个版本都留下了各自不同的修订痕迹。关于中文版本在学界就包括了初版、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等说法，外文版也包括了6种版本。

本文只围绕《红旗谱》中文版本进行主要研究分析。目前，学界已达成了《红旗谱》共有四个版本的共识，但对于出版时间却持有不同看法。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将四个版本列表以供参考。

版本	版本时间	出版社
初版	1957年11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二版	1959年9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三版	1966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四版	1978年4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表1《红旗谱》版本梳理表

二、《红旗谱》多版本中人物形象的改动

(一) 朱老忠革命形象再凸显

朱老忠作为《红旗谱》的主人公，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的身上一直孕育着反抗的精神品质，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学习，他开始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农民英雄。《红旗谱》在1957年一经发表，关于朱老忠形象的“革命农民形象”在学界展开了火热的讨论，并受到了一致好评。但是在赞扬声中依然有读者能够客观地指出初版作品的不足之处，主要问题集中在初版作品对于党的描述不够充分和深刻；朱老忠作为我党农民革命的主要人物，对于朱老忠入党前后的对比不够明显，缺少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后朱老

忠逐渐成熟的过程描写。梁斌在“文化大革命”前根据读者反馈的诸多意见对出版《红旗谱》做了两次修改，修改的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修订：面对大贵被迫当兵的观点

《红旗谱》第十一节至第十三节讲述了脯红鸟事件，冯老兰因为没有得到朱大贵和江涛的名贵鸟儿，强迫朱大贵当兵来借机报复。朱老忠在得知自己的大儿子被拉去当兵后，作者展开了一段精彩的描写。

（朱老忠）说：“好！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逆来，顺受。去吧，去当兵吧，在他们认为是‘祸’的，在咱也许认为是‘福’”^{[10]105[11]102[12]141}。

（1957年版、1959年版、1966年版）

上述段落在前三版均无任何调整，直到第四版中，作者将“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逆来。顺受。”这句话删改为“好！目前事情既然落在咱的头上，也别无它法了。也许坏事成了好事……”^{[9]122}朱老忠这一角色自出生就被作者赋予了反抗精神，在朱老巩固古钟被砸吐血身亡、姐姐被侵犯自尽后，他蛰伏三十年而后返乡只有报仇这一目的，他的阶级反抗性与逆来顺受的妥协是背道而驰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反应进行修改，把面对不公的忍气吞声变成了深谋远虑的大智慧，也更加贴合角色性格的设定。

2. 修订：对运涛革命热情的看法

出门在外打工的运涛在一次偶然中结识了中共地下县委书记贾湘农，在其不断引导下，运涛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回家便对自己信任的朱老忠讲述两人相识的过程。初版中的朱老忠在对革命事业表达支持后，又展现了些许担忧：“去吧！可是你去了，也要慢慢扑摸着看。”^{[10]116}

前三版对于此对话没有修改，直到1978年版梁斌将其修改为：

（朱老忠）说：“去吧！去吧！放心大胆地去吧！”“好！看样子，咱种庄稼的人们也有前途、有希望了！”^{[9]136}

（1978年版）

运涛对于是否帮助贾湘农开展农村革命工作是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状态，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具有见识的老忠叔。1978版的对话删掉了担忧的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由摸索转变成信心与支持，朱老忠对于革命中立的态度被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所取代，展现了无产阶级对党的感情有种天然的亲切与信任。

3. 增写：对党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朱老忠在召集乡亲一起进行反割头税运动的时候，去朱老明的家里进行深入交流，想得到他的支持。朱老明早年组织群众与冯老兰打了三场官司，都以失败告终，还闹了个妻离子散的下场。朱老明得知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时，心中依旧存在疑虑。针对朱老明的困惑，朱老忠进行了简短的解释，在前三版中此对话没有变化，在1978年版的作品里，作者增加了一整段话：

（朱老忠）低声说：“大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想打倒冯老兰，是万万不能的。运涛那时候，我后悔咱没有找到这个门路，如今江涛可是共产党的人，咱们不能放过了，说干就是干！”^{[9]288}

（1978年版）

此时，正是朱老忠和江涛从济南回来以后，朱老忠在回家途中听到农民群众自发性发起反抗斗争。体现了朱老忠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步加深，展现了文学作品人物思想成熟的过程，为朱老忠日后积极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展开工作做出铺垫。

4. 修订：面对张嘉庆中弹时的反应

在保二师学潮中，江涛、张嘉庆等学生在学校内被困十余天，他们拒绝了反动派投降，

最后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学生伤亡惨重，江涛被反动派抓捕。朱老忠和严志和二人知晓后，前往学校寻找江涛的下落，遇到正在被反动派追捕的张嘉庆。三人在师范学校门口被岗兵发现，张嘉庆被认出后不幸中弹。四版《红旗谱》中，都对朱老忠的行为反应作出了细致的刻画。

朱老忠一看，手脚战栗个不停，心里抖啊，抖得厉害。不敢去救张嘉庆，偷偷站在一边看着……朱老忠着实气愤，心里冷得战栗，瞪着眼睛看了一眼，迈开脚步走过去^{[10]235[11]451}。

（1957、1959版）

朱老忠一看，一时气血上冲，气愤起来。抖得厉害。手脚战栗个不停，心里抖啊，抖得厉害。他不能去救张嘉庆，偷偷站在一边看着……心里说：“狼心狗肺的东西们，等着吧！”^{[12]517}

（1966版）

朱老忠一看，一时气血上冲，气愤起来。心里抖啊，抖得厉害。他不能去救张嘉庆，偷偷站在一边看着……心里说：“狼心狗肺的东西们，等着吧！有我们收拾你们的时候！”^{[9]531}

（1978版）

从梁斌在1957版和1959版对朱老忠的反应刻画来看，张嘉庆被岗兵袭击中枪后，朱老忠面对敌人镇压自己的同志时充满了恐惧和怯懦，却没有丝毫愤怒，这种表现与他以往英勇无畏的形象存在偏离。在1966版和1978版中，梁斌将“不敢去”改为“不能去”，并增加了一段心理描写，体现了朱老忠对敌人暴行的愤恨与不满，在面对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的一时回避是理性的考量，朱老忠冷静沉着的品质得到充分体现，也使朱老忠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梁斌在此时期，着力于塑造朱老忠勇敢高大的农民形象，“不敢”带有胆怯、退缩的意向，有损朱老忠的高大形象，巧妙的修订让朱老忠的胆量与智慧得以体现，他深刻认识到革命的残酷与困难，方法也需要灵活处理，最后与冯大狗里应外合下，朱老忠和严志和成功救出张嘉庆，进一步刻画了他的先进抗日农民形象。

（二）严志和正面形象再强化

朱老忠是作家读者们讴歌的农民英雄形象，作家赋予了这一形象所有美好的积极的精神品质，“不仅继承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质量，古代英雄人物的光辉性格，而且还深刻地体现了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13]

但是严志和作为农民形象，却没有朱老忠身上闪亮的精神品质，他代表着中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代典型农民形象。他善良忠厚、谨慎小心，只想保住父亲出走前的“宝地”，让一家五口没有温饱问题。严志和第一次具有抗争性的活动与四十八村民一起状告地主冯老兰。可接连的失败，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薄弱。后来，大儿子运涛在济南被捕，为了凑够看望儿子的路费，他不得不把父亲留下的“宝地”贱卖给地主冯老兰。他的母亲也因为运涛被捕的噩耗刺激后不幸去世，生活带给他沉痛的打击。现实的被逼下，严志和接触到了共产党倡导的土地改革政策和社会的美好蓝图，所以他怀揣着对未来的向往跟着共产党进行革命。在前三版《红旗谱》中对于严志和形象没有特别修订，1978版对严志和形象修订最为突出，彰显了农民群众的爱国形象。

1. 删除：乞求冯老兰借钱情节

当严志和得知大儿子严运涛被捕入狱时，严志和凑不齐前往济南的盘缠，只能选择向地主冯老兰借钱。冯老兰尽显地主阶级的贪婪本色，借机向严志和讨要“宝地”。1957版中严志和只能乞求中间传话的李明德，“你跟老人家说说，帮补俺这一步。”^{[10]159[1978]}版则删除

了严志和称呼冯老兰为“老人家”这一内容，这一改动也说明了严志和面对地主冯老兰时，视对方与自己是平等的，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意识。

2. 删除：体现形象胆小怯懦内容

在 1957 版中，严志和看到第二师范学生被反动派血腥镇压后的惨状，他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但是在后来 1966 年版、1978 年版都有不同的删改。

严志和实在不忍离开，心里说：“人，见死能不救……”话是这么说，他不敢走
近，一走近了，就有人吓唬他。^{[10]235}

（1957 版）

（严志和）：“人，见死怎么能不救呢……”……，他不敢走近，他明白，在这
个情况下即使自己被捕了，也救不下他。^{[12]517}

（1966 版）

从 1957 版和 1966 版可以看出，1957 版的语句是陈述句语气，1966 版巧妙运用了反问句式，使情感更为强烈。1978 版更是删除了这段心理描写。严志和不敢走上前去的原因从害怕被敌人伤害变成了自己没有能力与敌人抗衡，为他的行为合理化。删除了他胆小怯懦的行为，打造了抗日群众有勇有谋的正面形象。

《红旗谱》前三版的第 57 节主要讲述了严志和在看到第二师范遭到血腥镇压和得知二儿子江涛被捕后，独自走在河边想要寻求自杀的情节，细致地描写了严志和悲痛欲绝下的一系列心理活动：

“我好命苦呀！”“天哪！我再也没有活路啦！”“如今身上更是沉重”“唉！
我严志和也该轻松轻松了！”^{[10]439-441}

（1957 年版）

严志和面对自己命运不公、前途渺茫时，想用自杀来解脱自己。但是 1978 版中，梁斌删去了上述文字，严志和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举动：

“阶级敌人好歹毒啊！”“天哪！不许人们抗日，我们的祖国要亡了！”“祖国
要亡了，要当亡国奴了”“抗日的人有罪？实无天理！”“也许，我们的祖国不会灭
亡！江涛和运涛还会回来。”^{[9]535}

（1978 年版）

严志和思考的内容从个人家庭转到了抗日群众和国家的安危，思考的深度也逐渐提升。他从担心自己面临的苦难转变成抗日事业和中华民族在抗日过程中的存亡。“亡国奴”体现了他正站在祖国主权民族独立的角度上担忧，将个人与国家民族命运绑在一起，并且对祖国充满信心。

3. 修订：对抗战前景的态度

严志和放弃投河自杀后，朱老忠带他回到了二人落脚的旅店，并与愁苦中的严志和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前三版对于该对话内容没有特别改动。在 1978 版修订中，梁斌删减了前三版内容，更加着重描写了二人抗日斗争的决心方面，具体改动如下：

序号	1957、1959、1966 版	1978 版
1	“两个孩子在监狱里，有谁去照管，你就忍心吗？” ^{[10]442}	“抗日的人有罪，我们中华民族就算完了！” ^{[9]535}
2	“我混蛋！我傻死了！这是做的什么梦？” ^{[10]443}	“有我们的党在，中华民族不会完的！” ^{[9]535}
3	“关起我的运涛，拿了我的‘宝地’，如今又要关起我的江涛……” ^{[10]443}	“我们是不会当亡国奴的！” ^{[9]536}
4	“我们为什么不能活？常说……就能挣扎，就能活下去。” ^{[10]444}	“回去我们就要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打鬼子！” ^{[9]536}
5	“老朋友！我，我活不成啦！” ^{[10]536}	“你也别开这个店了，咱们一块去打日本鬼子吧！” ^{[9]537}

表 2 朱老忠、严志和二人对话内容修订对比

序号 1 和序号 4 是朱老忠劝说严志和的内容，其他是严志和的回答。在前三版中，二人对话的核心都是从个人视角出发，1978 版将二人讨论的核心放在抗日斗争、民族存亡层面上。

前三版的序号 2 和 3 展现了一位绝望的农民形象，字里行间都在提醒自己的儿子、土地、家庭受到了迫害。1978 版中，严志和整体的情绪是高昂的，塑造了一位坚强不屈的抗日群众形象。在朱老忠的宽慰下，严志和对共同抗日充满着激情和活力，不同前三版中的自怨自艾，更多展现出坚定的抗日信念。

（三）抗日青年学生形象的再完善

1. 修订：抗日活动策略重心调整

梁斌曾在《〈播火记〉再版后记》中提到：“这样庞大的群众运动自发性很大，免不了会有缺点、失误，但广大群众是英勇的，他们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14]307}抗日青年学生的着重描写集中在保二师学潮活动中，青年学生面对敌人的封锁丝毫不妥协。

1957 版中，抗日青年学生都支持将在乡学生召集回学校进行斗争，1966 版中仍然保留了这一情节设计。1978 版中，对于进一步的抗日思路形成了“回乡抗日”和“在校抗日”两大阵营。江涛等人认为应该走出学校回到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夏应图等人认为应该将在乡的同学召集回来继续开展护校运动。

序号	1957、1959、1966 版	1978 版
1	“跑什么，又没偷人家，没摸人家的。” ^{[10]352}	“你说不应该回来，我也说不应该回来，群众要回来，老夏坚持要回来！” ^{[9]428}
2	“不要紧，怕什么哩？” ^{[10]352}	“没办法，群众劲头大，我现在是身不由己。” ^{[9]428}

表 3 江涛对于在校抗日的回答内容对比

表格内容为江涛对于“回乡抗日”和“在校抗日”的回答，在 1957 版中，江涛是完全支持“在校抗日”的思路，随后两版中也只是对个别字词进行调整。1978 版则体现出江涛对于回乡的赞同，留校的选择是面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妥协，他在留校期间一直劝说同学们“回乡抗日”，特别是说服夏应图的思想不断转变。

序号	1957、1959、1966 版	1978 版
1	“不能把敌人看得那样无能……强迫我们服从他的制裁， <u>也要形成鲜血！</u> ” ^{[10]352}	“不能把反动派看得那样善良……他要逮捕我们，……，强迫我们服从统治者的制裁， <u>把我们做为坚决抗日者，进行镇压。</u> ” ^{[9]357}
2	“最后， <u>他要逮捕、枪毙我们不是吗？</u> ” ^{[10]357}	“我看，这些 <u>反动派</u> 是要逮捕我们的” ^{[9]357}
3	“为什么过来过去光是 <u>流血</u> ？” ^{[10]352}	“这样，他们就是 <u>替日寇屠杀抗日同胞了</u> ？” ^{[9]433}
4	“我还不忍这样想， <u>我还不愿离开。</u> ” ^{[10]412}	“我还不忍这样想……。” ^{[9]501}

表 4 江涛对于在校抗日的回答内容对比

序号 1、2 是江涛的想法，序号 3、4 是夏应图的看法。江涛犀利指出夏应图对于敌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敌人不会采取实际行动，在序号 3 中，夏应图对于当下局势的判断有了变化，他认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残忍暴力的反动派，对于坚守学校的策略产生了动摇，“在校抗日”的思想逐渐瓦解。

2. 删减：小魏形象的软弱性消除

对于小魏这一人物形象，前三版无太大改动，小魏是一位动摇的知识分子，梁斌在 1978 版将小魏重构成一名抗日进步青年的形象。首先改动了小魏的家庭情况，在前三版中是这样描述的：

“父亲当团长……爱人儿娇滴滴的，挺漂亮。他就时刻不愿离开她……成了有名的爱睡老婆的。”^{[10]362}

(1957 年版)

“父亲是中学教员……爱人儿长得挺漂亮，思想也挺进步。每次假期……两个人并肩作战，在乡里开展工作……秘密发展农民协会，妇女协会……”^{[9]439}

(1978 年版)

小魏的家庭情况从落后的官僚家庭修订成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删去了小魏对于妻子的依恋，重构了一名独立的抗日青年形象，为小魏在乡村开展抗日斗争工作做铺垫。

在保二师学潮中，反动派将学校层层包围，校内人员因缺少粮食饱受饥饿。在前三版中，小魏依然是一名软弱的动摇人物，在身心饱受摧残的时候，他心想“还不如听母亲的话，早早离开这里，转学到北京去。”他把站岗的工作视为“苦刑”，种种想法都印证着小魏是温室家庭长大的孩子，即使他嘴里一直在强调“共产党我是拥护的”，面对困苦他却只会抱怨退缩。在 1978 版中，梁斌删除了所有关于小魏负面形象的内容，小魏的中立摇摆和软弱被遮蔽，让小魏从一名动摇知识分子形象转变为抗日青年进步知识分子，他也成为“回乡抗日”的支持者。回乡的理由由逃避学校被困的逆境变成根据抗日形势做出的思考，增强了小魏的理性和进步。1978 版中，小魏成功逃出学校奔向广大农村，许多抗日青年学生也走到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再次强调了“回乡抗日”的战略正确性。

三、《红旗谱》多版本中阶级矛盾的强化

张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她在 1955 年 9 月 27 日《〈红旗谱〉的审读意见》一文中就指出，“在高蠡游击战争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写得不够，因而暴动的气氛就感到不足了”。^[15]在随后的两个修订版中，梁斌对此做出了部分调整和修改，将阶级划分更加明确，特别强调了冯老兰和冯贵堂的阶级特性，将日常话语转变为阶级话语，强调了农民的阶级认同，不断突显对立阶级的对立特征。

(一) 重新划分阶级敌人

《红旗谱》中主要人物可以分为农民、地下党、地主、民国政府四类。但是农民也有中农、贫农、佣农之分。梁斌将这些复杂的关系概括为穷富斗争、国共斗争的两大底层逻辑。

在前三版中，阶级敌人主要讲述了冯老兰一人的种种罪行，1978版将阶级敌人重新分类组合，梁斌把蒋介石反动派、封建势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列为阶级敌人。贾湘农为江涛讲解国内阶级敌人现状时，前三版却只提到了“腐朽的军阀政客们”，直到1978版中，梁斌才将封建势力纳入革命对象的行列里。

“反割头税”是贾湘农和江涛联合群众发起的第一次革命斗争，贾湘农给江涛讲割头税不合理性时，前三版提到的阶级敌人被“有人”二字草草带过。但是1978版中，贾湘农对阶级敌人的描述做出了详细介绍：

“蒋介石颁布割头税……是为了剿共。而包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们，是为了赚一大笔钱养家肥己……土豪恶霸们……”^{[9]256}

(1978年版)

从1978版中可以看出，贾湘农对于当前国内复杂的社会关系有着清晰的认知，使阶级敌人形象更为具体，为农民接下来进行革命斗争理清思路，揭露了冯老兰和冯贵堂等人丑陋的嘴脸。特别是提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一群体，将蒋介石为代表的敌人和冯老兰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联系起来，体现出梁斌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有着正确清晰的认识。

(二) 强化敌人阶级特性

1. 增写：地主的封建性特征

冯老兰的反派形象贯穿作品始终，他的身上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封建地主的性质。在1978版中，梁斌着重笔墨写出冯老兰封建思想的思想根源，特别是冯老兰对压榨农民的行为进行了自我美化：

他们都过起舒服日子来，谁还死心受苦？……过个财主不是容易！^{[9]81}

(1978年版)

他从封建社会里过来，在封建思想的支配下，他总结了多半个世纪的经验，对于《朱子治家格言》，他背得滚瓜烂熟……他的思想僵化了。^{[9]82}

(1978年版)

他将自己处心积虑压榨农民的行为美化成自己节俭用度的习惯，认为农民为他死心塌地地受苦是理所当然，也侧面体现出当时农民被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奴性，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阶级敌人。

冯老兰经历了中国社会性质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封建传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梁斌对于冯老兰好色、阴险毒辣的形象进行了放大处理，重点表现在对于想霸占春兰等情节中，从他思想、爱财如命、物化女性、奴役农民等方面进行描写，使他的封建地主形象更加完整。

2. 增写：新型地主的资产阶级特性

在作品中，冯贵堂是一名出生在封建地主家庭而后接受了法科教育的大学生，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孕育出的产物，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代表。

冯贵堂得知朱老忠回乡后，给冯老兰分析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他希望冯老兰不要和农民群体再产生敌对矛盾，这也体现了冯贵堂较父亲有着先进的阶级认识。但是作者此时在文中加了一段对冯贵堂此人的评价，以全知视角暗示了冯贵堂无法摆脱的阶级局限性：

他虽然上过大学，有了一些文化，但阶级本质决定他，他还不懂得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9]79}

(1978年版)

对于冯贵堂身上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性质，作家在1978版中增写了许多细节。

日本维新才多少年，事业上发达得多……快要按着书本上，学着外国的方法耕种土地。^{[9]478}

(1978 年版)

冯贵堂一心致力于将父亲的资产进行改良，前三版中只是简单提到“他的主张”，1978 版中补充为“改良主义的主张”，冯贵堂不断给父亲讲述日本“维新变法”“外国耕种土地的方法”，强调了他主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革命主张不同，改良主义主张调和，特别是对生产方式的改进。但是在先进的思想背后，依然是以榨取劳动力为获取价值的生产方式。其本质仍是以剥削农民为本质的运作模式。冯贵堂身上背负着资本主义、改良主义、新型地主等形象特征，重新建构了“大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四、《红旗谱》多版本中政治话语的修正

(一) 无产阶级形象话语修订

1. 修订：对革命主体称呼

梁斌在 1978 版中着重梳理修改了对革命主体的称呼，表明了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运涛向朱老忠倾诉自己与贾湘农相识，他的革命热情被其点燃，朱老忠对于运涛的想法表示支持：

(朱老忠)：“……穷苦人翻起身来……你要是扑到了这个靠山，……也许扑摸对了。”^{[10]136}

(1957 年版)

(朱老忠)：“……工人和农民翻起身来，如今也到了咱的脚下。你要是扑摸到这个靠山，……也许扑摸到共产党的门口……”^{[9]136}

(1978 年版)

初版作品中，朱老忠讲革命主体是“穷苦人”，在 1978 版中修订成“工人和农民”。在 1978 版中，朱老忠具有了初步的革命视野，并且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和农民的靠山，人物也更加具有无产阶级意识。

2. 修订：朱老巩保护古钟的目的

《红旗谱》的开篇讲了朱老巩为保护古钟大闹野猪林。在 1958 版中，朱老巩从保护自己的家族出发，在 1966 版和 1978 版中将其目的修订为保护阶级的利益。

他们祖辈几代都是仇家，看样子朱老巩要报仇了。^{[12]40}

(1966 年版)

有胆量的人，要为四十八村的人抱不平了。^{[9]8}

(1978 年版)

可以从 196 版中看出，梁斌补充了两个家族积怨已久的背景，为朱老巩行为增添了合理性。在 1978 版中，朱老巩的行为是为了保护整个村民，代表着集体而斗争。作者将朱老巩护钟的目的从个人利益修订为集体利益，提高了农民英雄的思想觉悟。

对于护钟目的内容的修订也影响了朱老忠复仇的动机。虎子曾亲眼看到父亲站在村民前面保护古钟的英勇事迹，对冯老兰的仇恨深植于心中。在 1957 版中，朱老忠讲道：“我得回去报这分血仇”^{[10]16}。在 1978 版中，修订为：“我也要回去为咱四十八村的人报这分血仇”^{[9]20}。梁斌将朱老忠“为父报仇”修订成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复仇。将个人仇恨进行升华，并延伸到整个阶级后代。

(二) 重构运涛对党的认识

运涛在贾湘农的教导下，不断学习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革命理论，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醒，带动农民不断进步和成长。梁斌在前后版本中不断重构运涛对于共产党的认识，表

明其无产阶级立场。

类别	1957 版	1966 版	1978 版
党的性质	穷人党	穷人们的党	为咱穷人谋幸福的
革命形式	管理自己的事情	管理自己的事情	解放自己
革命目标	不再受人欺侮	不再受人欺侮了	不再受人压迫、受人剥削了

表 5 重构运涛对党的认识

从党的性质来看，由“穷人党”慢慢变为“为咱穷人谋幸福”的党，革命形式从“管理自己”变成“解放自己”，农民和工人要想获得自由必须有斗争的自觉性。他的认识从农民从被“欺侮”到被“压迫、剥削”，说明了运涛明白生产资料的私人制的所属问题，体现了运涛的思想逐渐成熟，对于阶级关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三）删去对“路线问题”的描述

《红旗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了猛烈抨击，“文艺黑线专政论”向当时许多文艺工作者强加“黑理论”“黑作家”“黑作品”的诬陷，“四人帮”禁止《红旗谱》进行再版，认为梁斌在创作中拥护王明路线并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称其为“黑旗谱”。梁斌后来曾表示：“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要从路线斗争的角度去表现和塑造人物。我歌颂的是广大工农群众、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歌颂他们针锋相对地反对蒋介石反动派投降卖国政策的英勇斗争。”^[16]”

第 54 节讲述了江涛和老夏讨论二师护校运动的策略问题，江涛意识到老夏与自己的想法有所矛盾：

敌人策略上有新的变化，他（老夏）还是停留在旧的路线上……使斗争走到目前的困境……旧路线的时代虽然过去，旧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11]414}

（1957 版、1959 版、1966 版）

到了目前，蒋介石反动派在策略上有了新的变化，可是他（老夏）还是停留在旧的观念上。^{[9]504}

（1978 版）

梁斌在第四版中删去了之前提到的“路线问题”这一概念，从现下读者视角来看此处修改是必要的。前三版中提到“旧路线”“新路线”“旧思想”“新精神”相关词汇，但是梁斌并未对以上词汇作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二师护校运动”发生在 1932 年 9 月，此时我党主要战略决策是由王明路线引导，江涛无法脱离时间限制对其作出新旧的评判。因此，梁斌对于作品这一调整是更符合文本情境的。

结语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政权在确立后需要在文艺作品上来鼓舞人们对建设新社会充满激情与信心，叙述新生政权的现实合法性，该时期的文学带有民族国家的想象意味，文学作品的角色往往与国家和社会紧密联系，以个人的发展隐喻国家的发展方向，因此梁斌的《红旗谱》在时代中应运而生。

《红旗谱》中三代农民的斗争故事代表着三个不同时代。朱老巩代表着传统农民自发斗争，因为时代和个人思想的限制注定了结局的失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群体代表着第二代农民，他们从为家族复仇的使命转变成为阶级复仇。第三代的代表则是二代农民的孩子们，

他们经过学习无产阶级先进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集合着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进行斗争和反抗。分析《红旗谱》需要结合“成长小说”这一概念，而在此作品中，主人公就是第二代农民代表朱老忠。梁斌对于朱老忠的定位从来不是静止的人物形象，他的身上肩负着两个时代的使命和要求。在贾湘农和江涛等人的启蒙引领下，朱老忠逐渐学习—接受—实践革命进步知识，深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启蒙。

对于朱老忠来说，个人的“成长”更多代表着时代的发展和走向。我们需要从“成长小说”的特殊要求来分析这一人物形象。由于作品中带有的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必然会随着政治意识的波动和变化受影响。梁斌在时代发展、个人思考和读者声音中，对作品进行了3次修订。《红旗谱》的4个版本中，修改变动最大的当是1978版。从标点符号、章节段落到人物形象、情节设置，通过各处变化，反映的是作家在力求塑造伟大的革命者形象，歌颂农民英雄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英勇无畏的精神品格，政治类话语修改比重逐渐上升。文章通过对《红旗谱》四个版本中政治话语相关部分的修改情况重点分析，从而研究《红旗谱》不同版本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文本话语内容的政治性逐渐增强。

笔者从人物形象、阶级矛盾、政治话语三方面分析，通过对不同版本文本进行细读，列出梁斌对作品修订、增加、删减不同现象。例如，在前三版中对于“路线问题”中提到“旧路线”“新路线”“旧思想”“新精神”，梁斌认识到人物在当下时代的限制，无法对革命路线做出新旧评判，对此删掉此类描写，更加符合逻辑关系，这是正确的。对于阶级敌人形象完善和刻画也更好理清了中国社会矛盾交错的本质关系。但是在“脯红鸟”事件中，删去了朱老忠面对儿子被迫征兵的消极想法，修改了朱老忠对运涛革命热情的看法。即使是为了拔高农民英雄的高大形象，但是忽略了人物性格和思想发展的客观过程。朱老忠在当时的情境下，是一名从未受过革命思想影响的传统农民，面对亲人离去的打击产生无奈和消极的情绪是情理之中。在第四版中对于严志和的形象修订也存在此类问题。当严志和看到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倒在血泊之中，儿子也不见踪迹的时候，产生自杀的逃避想法实属正常。结合全文，对于严志和的描写更多的是一名懦弱善良的农民，只想守住自己的宝地。第四版中将他自杀的原因从儿子被捕变为对革命失败，自己不愿做一名亡国奴。前三版中对于严志和想自杀并进行自我思想斗争的描述更为符合人物形象。虽然梁斌在第四版中着重笔墨去提高朱老忠和严志和的形象，但此次改写并不符合人物发展规定。

综上所述，《红旗谱》的修订是作者在作品人物形象、阶级对立、政治话语的反思基础之上，通过修订人物命运、完善人物形象、阶级斗争来层层铺垫，揭示了作家对于作品精雕细琢的审美情怀。修订经典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梁斌对经典的修订有锦上添花，同时也会出现矫枉过正的问题，这是由于时代限制而无法避免的情况。无论成败，这些都是宝贵的研究素材，我们应该正视此类文学现象，并挖掘其背后的文学价值，对十七年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历程进行再思考。

参考文献：

- [1] 郭文静.《红旗谱》新旧版本的比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3).
- [2] 张立.《红旗谱》的老版本[J].中国商报,2007(11).
- [3] 田英宣.谈《红旗谱》的版本[J].燕赵学术,2009(02).
- [4] 龙瑶.《红旗谱》版本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 [5] 龚奎林.“故事”的多重讲述与文艺化大众[D].河南大学,2009.
- [6] 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4.
- [7] 支永碧.基于语料库的政治话语语用预设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 [8] 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 [9] 梁斌. 红旗谱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 [10] 梁斌. 红旗谱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 [11] 梁斌. 红旗谱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12] 梁斌. 红旗谱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6.
- [13] 《文艺报》编辑部编. 文学十年 [M]. 北京: 中国作家出版社, 1960.
- [14] 梁斌. 梁斌文集(第6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5] 张羽. 《红旗谱》审读意见 [J]. 编辑之友, 1985(01).
- [16] 梁斌著. 播火记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85.
- [17] 李杨.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 [18] 支永碧. 基于语料库的政治话语语用预设研究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 [19] 金宏宇. 新文学的版本批评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20] 蓝爱国. 解构十七年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21] 贺桂梅. “50-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
- [22] 师晓晖. 文学出版与“红色经典”的“经典化”历程研究 [D]. 东北师范大学, 2023.
- [23] 郭剑敏. 革命·历史·叙事——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小说(1949—1966)的意义生成 [D]. 浙江大学, 2006.
- [24] 孙伊莉. 《红旗谱》革命经验叙述研究 [D].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25] 王雪力. 梁斌《红旗谱》修订机制研究 [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22(04).
- [26] 聂晶晶. 论《红旗谱》的多重叙事 [J]. 保定学院学报, 2021(06).
- [27] 田英宣. 《红旗谱》老版本证疑 [J]. 沈阳大学学报, 2008(03).
- [28] 王平, 周悦三. “农民革命”历史叙述的精神向度——再谈《红旗谱》 [J]. 当代作家评论, 2022(04).
- [29] 罗先海. 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的问题、资源与路径 [J]. 文艺理论研究, 2024(01).
- [30] 罗先海, 金宏宇. 版本视域下的“十七年”长篇小说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02).
- [31] 刘銮娇. “十七年”时期中国长篇小说出版研究 [D]. 北京印刷学院, 2014.
- [32] 邓声国, 龚奎林. 论“十七年”小说版本的内容修改 [J]. 小说评论, 2011(06).
- [33] 龚奎林, 黄梅. “十七年”小说版本修改的原因考察 [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1).
- [34] 田英宣, 张凤燕. 《红旗谱》研究五十年述评 [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A Study on the Revision of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Red Flag"

ZHU Mengmeng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8, China)

Abstract: As a classic work of the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1949-1966) in China, "The Red Flag" has attracted two distinctly different types of critical opinions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Liang Bin, the author, revised the work four times between the 1950s and 1970s. This study takes the four different editions of Liang Bin's red-themed novel "The Red Fla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editions, and analyzes the changes across versions by integrating the specific literary creation context, the author's subjective factors, and readers' critical opinions.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selects three dimensions—"modifications to character images", "strengthening of class contradictions", and "revis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influences behind the textual reconstruction. Revising a classic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process. Liang Bin's revisions to this classic have both enhanced its merits ("adding flowers to the brocade") and led to overcorrections. Such issues were unavoidable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imes. Readers should face up to the literary phenomenon of textual revision, explore the literary value contained within it, and rethink the research on the canonization of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period.

Keywords: Liang Bin; "The Red Flag"; edition revision; political expression

代理人冒名签订保险合同的法律责任分析

偶见¹ 卢洋² 周羿所³ 吴招娣⁴ 吴兴生^{5*}

(1. 阳江仲裁委员会, 广东 阳江 529500; 2. 河源理工学校, 广东 河源 517000; 3. 广东天穗(河源)律师事务, 广东 河源 517000; 4. 广东白云穗和调解中心, 广东 白云 510470; 5. 阳江仲裁委员会, 广东 阳江 529500)

摘要: 本文结合一例保险代理人冒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名义签订分红型年金保险合同的诉讼案例, 系统分析代理人冒名签订保险合同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文章从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在民事层面, 探讨了合同效力的推定规则与无效合同财产返还原则; 在行政层面, 分析了代理人违反监管规定的行政责任; 在刑事层面, 评估了代理人行为可能构成的合同诈骗罪。本文指出,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综合考量案件事实, 依法推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坚持双向返还原则, 避免单方利益失衡。同时, 保险公司应加强对代理人的管理与监督, 完善内控机制, 防范代理人与客户合谋套利等道德风险。

关键词: 代理; 冒名签约; 保险合同无效; 法律责任; 追偿; 行政处罚; 合同诈骗

一、引言

一个案例, 以被代理人和客户联手坑惨了为题, 运用文字+短视频方式介绍了一例诉讼案(后被人保等业内人士创办的微信公众号转发), 该案涉及保险代理人冒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名义签订保险合同引发的法律纠纷。笔者阅后认为, 本案代理人应承担法律责任, 故撰文分析。

二、案情梗概

2016年1月1日, 保险业务员张某经办, 以其妻李某为投保人, 以其已成年女儿小冉为被保险人, 投保了一份分红型年金保险, 缴费期10年, 保费20万/年。保单利益主要有:

(1) 年金。犹豫期届满后, 每年领取年金。 (2) 红利。 (3) 身故保险金。

截至2019年, 保险公司收取了3期保险费, 也支付了3期年金和保单红利。

2019年, 李某和小冉向法院提起诉讼, 以投保单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故保险合同无效为由, 要求判令保险公司全额退还保险费, 并赔偿利息损失。

保险公司抗辩提出: 电话回访投保人时, 投保人李某承认是亲笔签名。经保险公司申请, 当地司法鉴定中心对投保单笔迹作出鉴定, 倾向认为投保单不是李某和小冉的签名。原告律师庭审中还拿出小冉于2015~2016年去英国的护照, 以证明2016年1月1日签单时被保险人在国内, 不可能在投保单上签名。

保险公司要求传唤业务员张某出庭。法院向张某发送了传票, 但张某拒不出庭。

一审法院认为, 被保险人小冉同意投保证据不足, 且其现在明确反对这份保险合同, 合同依法无效, 判决保险公司返还60万保费。由于李某本身也有过错, 驳回其对利息的诉讼请求。

作者简介: 偶见(1963-), 男, 仲裁员。

卢洋, 中级讲师。

周羿所, 律师。

吴招娣, 调解员。

通讯作者: 吴兴生(1974-), 男, 高级工程师, 中国财政部政府采购网特聘专家, 仲裁员。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并提出当时把函件寄到英国，让被保险人签字。二审以被保险人坚决不认，保险公司也拿不出当初邮寄证据为由，未采信保险公司的意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法律责任评析

（一）民事法律责任分析

《保险法》第 10 条第 3 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3 条第 1 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唯其具有领取保单红利、主张退还保费的权利。本案保险为分红型保险，保险公司收取了 3 年保费，并派发了 3 期红利。若本案保险费系由李某缴纳，或其领取了保单红利，应视为其对投保单代签名的追认，签字鉴定不得推翻其追认之法律效果。

李某既然不认可投保单代签名的效力，否定其投保人身份，即表明保险费非其缴纳，则其也就无权主张所谓 全额退还保险费。李某以未实际签名为由否定该保险投保行为效力，又要求全额退还保险费并赔偿利息损失，二主张相互矛盾。本案法院未确认实际缴费人，判决保险公司向不承认自己投保人身份的李菜返还 60 万保费，给予李某 60 万元不义之财，是错误的。

《保险法》第 34 条第 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1 条规定：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额：（一）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同意而未表示异议的；（二）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的；（三）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

年金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生存为条件，按月、季、半年或年给付保险金，直至被保险人死亡或保险合同期满的生存保险。年金保险领取人一般为被保险人。本案保险合同犹豫期届满后，保险人已支付 3 期年金。若被保险人小冉在领取年金时未表示异议，应属于 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保险合同有效；其现起诉不同意保险合同，得作解除处理。

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国境和到外国旅行或居留时，由本国政府发给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官方证件，是公民旅行通过国际口岸的一种通行证明。即护照仅仅是对持证人出入国（境）的许可，只为到他国旅行或居留提供可能，其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持有人护照有效期内一定在他国。本案仅凭小冉于 2015~2016 年去英国的护照，不足以证明 2016 年 1 月 1 日签单时被保险人不在国内。

辅导投保人填写投保单，见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是保险代理人的工作职责，保险公司一般不会代替保险代理人径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联系邮寄投保资料以签字确认，故保险公司不可能拿出所谓当初邮寄的证据。保险公司上诉所提出的 当时把函件寄到英国，让被保险人签字，似乎是诉讼代理人的想当然。

本案保险合同签订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投保人于 2019 年提起诉讼，《民法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案应适用《合同法》, 但二者有关合同无效后果的规定基本相同。

《民法典》第 155 条规定: 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 157 条第 1 句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

《合同法》第 56 条规定: 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 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 58 条第 1 句规定: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

合同无效是指因欠缺一定生效要件导致合同当然不发生效力。合同无效特征是:

(1) 自始无效。无效合同自订立时起即无法律拘束力, 无需任何程序确认。(2) 当然无效。不须当事人主张, 裁判机关得依职权径判合同无效。(3) 绝对无效。无效合同不可能以追认或履行方式转变为有效, 任何人均得主张无效。(4) 确定无效。不须裁判机关裁判, 合同均为无效。(5) 无效效果的封闭性。合同部分条款无效, 不及于合同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仍具效力。

本案保险合同既然被认定为无效, 不应仅保险公司单方面全额退还保险费(暂且不论向谁退还), 原告方所领取的红利和年金也应退还给保险公司。本案法院仅判决保险公司单方返还 60 万保费, 而对原告方所领取的红利和年金只字未提, 裁判严重疏漏。倘此案成例, 保险公司收一笔保险费, 不仅全部退还, 还搭上代理人佣金(含奖励)、生存保险金和红利, 或恐为当前猖獗的退保黑产指出一条新的、效益更高的生财渠道, 会严重扰乱保险市场秩序, 甚至有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之虞。

(二) 代理人的诉讼地位与责任追究

《民法典》第 164 条规定: 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 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 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保险代理合同一般会约定保险代理人代理保险业务中的义务及其违反义务时所承担的合同责任。如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保险代理合同书约定: 乙方(代理人)应当认真、正确指导客户填写投保书及相关投保资料, 并将自己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可能会影响甲方承保及承保费率的有关客户的情况, 如实填写业务员报告书, 告知甲方代理合同期间, 乙方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遵守社会公德、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严格在甲方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若乙方发生下述行为的, 视为违反本合同义务, 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责任: 在投保书、建议书、客户权益确认书、契约审核函件、体检报告书中的健康告知、各类疾病问卷、授权委托书、委托转账合同、保单回执及各类变更申请书等甲方规定需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监护人)本人亲笔签名的相关保险资料, 非客户本人亲笔签名、代客户签名或唆使他人代客户签名乙方如有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或未履行本合同义务, 甲方有权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对乙方进行处罚。如给甲方或客户造成财产损失的, 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如该经济责任确应由甲方先行承担的, 甲方有权在乙方的代理费及缴纳的单证押金中扣除; 对不足弥补损失的部分, 甲方有权继续向乙方进行追偿。

本案投保单经鉴定不是投保人李某和被保险人小冉的亲笔签名, 保险合同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保险代理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保险公司因全额退还保险费所导致的损失, 即所退保费与保单现金价值之差额。

《民事诉讼法》第 7 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第 59 条规定: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 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 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

本案保险业务系张某经办，张某系投保单签名与电话回访真实情况的唯一知情人，保险公司全额退费后会追究其违约责任并追偿损失。因此，保险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张某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张某不仅是本案关键证人，亦是诉讼第三人，法院应当依法通知其以第三身份参加诉讼，通过庭审调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同时，张某与两原告分别为夫妻、父女，存在利益关系，法院向其发送传票，其拒不出庭，得推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而未表示异议。

（三）行政责任分析

《保险法》第 131 条规定：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从业人员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九）串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骗取保险金。

第 172 条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违反本法规定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第 76 条规定：保险代理人及保险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不得违反规定代替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第 109 条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依照《保险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应当予以处罚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罚；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 万元。

本案保险代理人张某违反《保险法》规定，冒用李某名义订立保险合同，并伪造投保人李某和被保险人小冉签名，故意向保险公司提供错误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通讯信息，并安排人员冒充投保人李某，设计骗过保险公司电话回访，保险公司得报请保险监管机关给予张某以行政处罚。

（四）刑事责任分析

《刑法》第 224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有：（1）主体一般主体。即年满 16 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也可构成本罪。（2）主观方面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3）客体 不仅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还扰乱市场秩序。（4）客观方面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设定陷阱等手段骗取对方财产。常见行为如虚构主体、冒用他人名义、编造虚假理由等。（5）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于 2024 年 1 月 8 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我省执行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意见》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 6000 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 10 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与保费均衡制恰恰相反，期缴保单佣金发放采非均衡制，主要集中在保单前 3 年（这也是保单初年度现金价值偏低的重要原因）。有些寿险公司的一些险种，首年佣金与奖励之和甚至超过首年度保费，以致发生代理人恶意签单后退保套利的案件（业内称为 佣金套利 投保套利），是指在长期性人身险经营中，保险销售人员、销售团队或代理机构利用首年佣金、

激励费用和退保金额之和高于新单首期保费而形成的价差，套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本案：（1）张某与投保人李某、被保险人小冉分别为夫妻关系、父女关系，三人系利益共同体；（2）张某伪造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签名，故意提供虚假的投保人通讯信息，安排人员冒充投保人李某接受保险公司电话回访；（3）保险相对人依合同已领取红利、年金；（4）在取满高比例年限的业务佣金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提起保险合同无效诉讼；（5）在投保人、被保险人起诉要求保险公司全额退费时，张某拒不出庭作证 诚如网友评论所怀疑的 这等于是诈骗了，保险公司吃了哑巴亏！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或者是有高人指点，或者是黑产出的主意！

本案年缴保费 20 万，仅 3 年佣金（含奖励）即远超 6000 元之 数额较大标准，3 年佣金（含奖励）+红利+年金或可达 10 万元之数额巨大标准。若本案为真实案件，保险公司应向公安机关报警。

四、结论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若未亲笔签名，依法得以推定方式确认同意。在投保人拒绝承认投保人身份的情况下，不应判决向投保人退还保费。本案若为真实案件，不仅应追究保险代理人的违约责任，还应追究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案件介绍人细微 CV 也不禁疑惑：她们明明是一家人，这边父亲做完了业务，拿了佣金跑了，回头母女俩来告全额退保，自己却不退回这三年已经拿的钱……保险公司不仅赔了业务员佣金、前三年所有的年金收益和分红收益，还要退还全部的保费给到这一家人，那么你赞同这个判决结果吗？

本案警示保险用业须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对代理人的管理与监督，防范代理人与客户合谋套利等道德风险，促进保险市场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S]. 北京, 2015.
-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S]. 北京, 2020.
- [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S]. 北京, 1999.
- [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S]. 北京, 2020.
- [5]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S]. 北京, 2020.
-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S]. 北京, 2013.
-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S]. 北京, 2015.
- [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S]. 北京, 2021.
- [9]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公安厅. 关于我省执行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标准的意见[Z]. 2024.

Legal Liability Analysis of Insurance Contracts Signed by Agents Under a False Name

OU Jian¹, LU Yang², ZHOU Yisuo³, WU Zhaodi⁴, WU Xingsheng^{5*}

(1. Yangjiang Arbitration Commission, Yangjiang, Guangdong 529500, China; 2. Heyuan Polytechnic School, Heyuan, Guangdong 517000, China; 3. Guangdong Tiansui (Heyuan) Law Firm, Heyuan, Guangdong 517000, China; 4. Guangdong Baiyun Suihe Mediation Center, Baiyun, Guangdong 510470, China; 5. Yangjiang Arbitration Commission, Yangjiang, Guangdong 529500, 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ith a litigation case where an insurance agent signed a participating annuity insurance contract in the name of the policyholder and the insured without authoriz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legal liabilities that agents should bear for signing insurance contracts under a false nam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 from three dimensions: civil,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liabilities: At the civil level, it explores the presumption rules for the validity of contracts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perty return for invalid contracts; At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it analyzes the administrative liabilities of agents for violating regulatory provisions; At the criminal level, it asses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agent's act may constitute contract frau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when hearing such cases, court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facts of the case, legally presume the true intent of the partie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turn of property, and avoid unbalanced interests of one party. Meanwhile, insurance compan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agents, improve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and prevent moral hazards such as collusive arbitrage between agents and clients.

Keywords: agency; signing under a false name; invalid insurance contract; legal liability; recovery of losses; administrative penalty; contract fraud

四川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及对策研究

柯贤飞

(莫吉廖夫国立大学, 白俄罗斯 莫吉廖夫 212022)

摘要: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频繁提及要利用好红色资源并传承红色血脉这一战略需求,针对新时代如何传承红色文化实施了系统规划,四川省属于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为宽广且历时最久的革命老区,它既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关键地带,又蕴含着独一无二的红色文化遗传密码,在这里留存着长征精神的完备踪迹,而且在新中国创建过程中催生出诸如三线建设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之类的诸多精神谱系,从而塑造起超越时光限制的红色文化方阵。历史洪流之下,四川红色文化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雪山大渡河塑造起革命丰碑,三线建设创建起战略根基,国防奇迹令人震撼,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四川红色文化一直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这样一种既传承历史文脉又带有时代新特点的文化形式,不但给巴蜀文化增添了坚韧有为的精神品质,而且在“两个结合”的鲜活应用当中表现出独有的价值,它是承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地方标志,四川红色文化得到传承发展,会给文化强省创建带来精神支持,还能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创建应用相融合给予地区智慧,显示出红色基因在新时代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红色文化;四川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策略

1. 研究背景

当下,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呈全国布局,全域推进之态,其在理论阐释,教育践行,文旅融合等方面收获颇丰,但冷静观察,也遭遇三重现实难题:其一,认知上存在代际沟壑,青年群体对红色历史的共情力尚需提升;其二,流传手段务必更新求变,传统陈列形式与新媒体流传未达有效交融;其三,产业发展质量良莠不齐,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有趋同,浅显化现象,要想解决此类短缺,一方面得加深红色文化理论探究,创建具备学理依循的话语系统,另一方面则要革新应用途径,促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四川省属于红色文化资源大省,这里的红色文化谱系有着独有的历史纵深和现实广度,从雪山大渡河的壮美史诗,到川陕苏区的烽火岁月^[1];从三线建设时期的热血芳华,再到抗震救灾时的举国同心,四川的红色文化一直同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用根基,又包含着革命文化的精神密码,而且在新时代还催生出脱贫攻坚精神等崭新的时代篇章。加大对四川红色文化的研究力度,这既是对“两个结合”这一重大命题作出的区域回应,也是创建富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操作考察,通过系统整理四川红色文化的历史脉络,理论意蕴和时代意义,可以精准找到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实际难题,给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给予决策参照,进而为全国红色文化的发展奉献四川的才智,促使社会主义文化迈向新的辉煌。

2. 四川红色文化的演进脉络

四川红色文化产生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历史变革的大背景之下,这是时代潮流与社会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源头能追寻到“五四运动”那个时期,新思想的星

作者简介:柯贤飞(1999-),男,硕士研究生,后勤主管,研究方向为社会教育学与心理教育、小学语言、现当代文学。

星之火宛如春风化雨般，激发起四川民众对于进步和变革的热忱，于是乎，四川红色文化就在这片满怀希望的土地之上开始生根发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四川红色文化历经血与火的淬炼逐步成形并且兴旺起来，数不清的革命先烈们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化作成四川红色文化最为鲜活的阐释，不断充实着该文化的内涵与底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创建的漫漫征途中，四川红色文化慢慢成长起来，踊跃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创建的各个层面当中，给四川地区的社会发展给予了强劲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变成引领人们奋发向前的精神旗帜^[2]。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四川红色文化获得新的发展契机，特别在新时代背景下，四川红色文化持续于传承进程中革新，又在更新过程中得到发展，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紧跟时代脚步，不停给予自己崭新的内涵及价值，从而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与活力，在新时代绽放更为夺目的光彩。

2.1 四川红色文化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里，四川的红色文化在已有的根基之上持续深入并加以扩展，渐渐塑造起专属的文化表现样式，彰显出独有的韵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落脚于四川，恰似一座稳固的灯塔照亮前行道路，全省群众快速投身到重建家园的热潮当中，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切实让广大农民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3]；而在城市之中，通过稳定物价以及救助失业工人和农民等举措，仿佛一场及时雨润泽人心。“三反”“五反”运动在全省范围展开，恰似一场及时雨，冲刷掉社会上的污泥浊水，使得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给国民经济的恢复形成稳固根基，这样的付出既给四川的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强劲活力，又给四川红色文化的发展供应充裕的物质养分，此期间，四川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改造这项伟大工程当中，达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先进文化的转变与过渡，做到了质的提升。

四川属于三线建设重点省份，其在国家战略布局里占据关键地位，三线建设期间，四川大地上一片火热，三百多家科研院所拔地而起，好似繁星闪烁，众多新兴工业城市也纷纷冒出，成了四川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成昆铁路，成渝铁路等重大交通设施先后完工，把四川同外部世界紧密相连，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三种精神，它汇聚了建设者们的才智，心血以及付出，成为四川红色文化的主要构成局部。党中央把核武器研发基地迁到四川，这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决策，让四川成了“两弹一星”精神的关键发祥地，科研人员在艰难困苦之中默默付出，舍弃性命，用他们的才智与胆量给国家的国防事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两弹一星”精神就像一座永远的丰碑，推动着四川人民持续向前迈进，这段时间里，四川的红色文化好像绵绵春雨一般四处流传开来，做到了大众化的目的，它不停地融进抗美援朝精神，三线精神以及“两弹一星”精神等新内容，恰似万流归宗，充实并拓展了自身的内涵，这些精神宛如闪耀的星星，点亮了四川红色文化前行的道路，促使它在新时代进程中绽放更为夺目的光彩。

2.2 四川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焕新之路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步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大环境之下，四川红色文化好似一颗被再次擦亮的明珠，绽放出新的光彩，挖掘出新的价值，它既深情回顾革命与建设年代的峥嵘岁月，又鲜活体现那些闪耀着光辉的红色元素及丰富的文化成果，而且紧扣时代脉搏，清楚地映现出当今时代特征，变成了联系往昔与将来精神纽带，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着远见卓识，深切体会到文化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给文化事业的兴盛指明了明晰的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文化强国”战略的宏大画卷慢慢铺开，恰似一阵劲风，使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再掀高潮。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意味深长地提及红色基因的传承问题，他叮嘱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却党的初心与使命，此般话语如同明灯一般，给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赋予了基

本遵循,指明了前行方向,自从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四川省委一直坚守不渝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全方位且深层次地执行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四川工作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的有力引领之下,全体四川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起去克服各种复杂多变的困难局面,大胆直面诸如芦山强烈地震,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特大洪水灾害之类的重重阻碍。在此波澜壮阔之历史进程当中,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以及伟大抗疫精神恰似一道道夺目光芒,照亮了四川红色文化前行之路,给它增添了新的内涵,这些精神不但充实了四川红色文化的内容,而且推动其形式持续更新,四川红色文化正在新时代的舞台上以崭新面貌撰写属于自己的璀璨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磅礴精神力量。

3. 四川红色文化的多元价值

3.1 理论价值

3.1.1 历史印证

四川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历史的重要体现形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基因,是革命历史的一种关键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四川红色文化包含长征精神,红军精神,苏区精神,也涵盖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三线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积极因素,新时代下,四川大力推进其传承发展,给人们带来精神滋养,四川红色文化当中存在诸多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这是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极为珍贵的素材。留存至今的红色遗迹、革命旧址等承载着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其凭借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大量红色文物资料,真实的革命故事及英雄事迹,给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创建提供强有力的历史印证,这既是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与否的一种科学客观论证,也是新时代开展思想教育的鲜活素材以及汲取革命精神养分的有效渠道。

3.1.2 思想教育

四川红色文化包含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是广大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素材,有着不可漠视的思想教育价值,其对于提升人们的爱国热情,引领人们学习革命精神,传承革命传统和道德有着悠远的影响。

四川红色文化有着浓厚的爱国主义价值,其不少内容包含爱国主义情怀,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素材,红军长征路过四川时所做的宣传及群众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军民奋勇抗击日寇的事迹等等,均能有效地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尊心,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四川红色文化具备关键的革命精神教育价值,四川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主要发源地和战斗堡垒,保存了许多重要的革命遗址与革命文物,这些都是传承革命精神实施革命精神教育的关键物质依托。通过参观游览、聆听讲解时,人民群众可进一步知晓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及其斗争进程,进而唤起爱国热忱并提升民族荣誉感,四川红色文化具备重大的革命传统及道德教育意义,其蕴含诸多有着厚重历史根基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故事及人物,体现出革命传统与道德,朱德,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拥有的革命传统与道德,巴蜀文化独有的魅力等等,这些故事和人物既能引发人们对于革命历史的兴趣与喜爱之情,又可为革命传统和道德的流传发展赋予宝贵的素材与启发。

3.1.3 文化传承

四川红色文化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建有着关键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然化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现今,我们倡导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务必要从其中获取丰厚滋养,不然便没有生命力与影响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积淀下来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一种体现形式,四川红色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片肥沃土壤上孕育而生并且不断发展起来的,它

继承并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有关爱国主义、奉献精神以及艰苦奋斗之类的内容，这属于新时代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做的一种传承及更新之举，在新时代背景之下推动四川红色文化向前迈进，有益于增进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唤起大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觉意识，并树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心。

3.2 实践价值

3.2.1 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强大动力支撑

四川红色文化所包含的革命精神以及英雄事迹恰似一股清泉，给全面从严治党注入源头活水，其可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增进廉洁自律意识，从而有力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其一，四川红色文化有益于加强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思考将要到哪里去，才会明白该朝什么方向走，”四川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鲜活体现，蕴含着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开展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极为珍贵的文化财富，通过深入开展四川红色文化专题学习，踊跃参加四川红色文化有关活动，党员干部便能沐浴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之中，真切体会革命先辈的崇高革命精神。其一，可以巩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创建工作，而且能够优化他们的党性修养和思想认识水平，促使全体党员更为坚决，更为自信地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行，其二，四川红色文化有益于塑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彰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特性和主要特征，包含着丰富的精神实质与操作准则，四川红色文化属于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四川人民在革命，建造，革新进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先进文化，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承载者，它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和践行供应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并赋予诸多素材，从而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扎根于人心。

3.2.2 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活力

四川红色文化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合成局部，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建进程中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第一点在于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文化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地位，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创建，革新历程中产生的优良传统与革命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大力宣扬红色文化，可以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与践行，促使全社会树立起一致的价值目标并营造优良的道德风气，第二点则是提升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四川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关键彰显，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形成局部和表现形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建联系密切，传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可以唤起全体国民的爱国热忱，加强民族凝聚力和荣誉感，优化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其三，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建载体，四川红色文化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教育意义，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进程里，四川红色文化给予了丰厚的精神支持和多元的创建载体，给流传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赋予了最好的途径。通过更新红色教育途径，拓宽传承红色血脉的渠道，可以进一步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建的载体，其三，带动有关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四川红色文化给四川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给予了诸多文化资源，对四川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我国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也有积极意义，深入发掘并利用好四川红色文化资源，有益于推动文化产业革新发展，促使文化与经济深度交融。

4. 四川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状分析

四川省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长久以来一直把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当作自身使命，特别是近些年来，更是聚集力量，精确施策，大力推进红色文化传承发展迈上新台阶，通过对四川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相关资料加以搜集梳理并细致剖析之后就可发现，四川在红色旅游，红

色资源守护,红色教育等诸多重要方面皆收获了阶段性的突出成果,从而为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构筑起稳固根基。

4.1 红色资源保护有序推进

四川属于红色资源大省,一直把红色资源保护放在重要地位,近些年来,许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保护政策陆续制定出来,给红色文物,革命旧址,伟人故居等给予了持续有效的保护。

2024年,四川省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红色资源保护名录,这份名录覆盖范围很广,它包含像成都市烈士陵园这种重要的旧址、遗址遗迹、纪念设施和场所,也有许多珍贵的档案、文献等实物,给红色资源的精确保护给予了清晰的方向,阿坝州属于四川的一部分,其在红色资源保护方面成果突出,阿坝州采取日常巡查和全面普查相融合的办法,一方面巩固了红色资源的安全防线,另一方面深入探究革命文物的留存使用情况,创建起完备的保护档案和数据库,到现在为止,全州已经登记并公布诸多不可移动和可移动的革命文物,而且打造出不少红军长征主题的博物馆、纪念馆,这些都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主要地点。四川属于全国较早制定红色资源保护相关规定及其配套执行措施的省份,自从《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开始施行以后,红色资源的定义与范围得到明确界定,这给保护工作赋予了稳固的法律依据,依托于此,达州市等地方也按照本地实际情况,陆续制订有关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的条例,从而更为详尽地明确保护举措和准则,使得红色资源保护工作具备更强的指向性与实用性。

从具体操作角度看,四川各地积极采取行动,全力推动红色遗迹保护事宜,比如会理市针对现存的长征革命遗址展开了妥善守护举措,而且还依托这些遗址塑造起了红色文化带,把红色资源像珠子一样串联起来,进而营造出带有本地特色的红色文化景致,而广元市昭化区就对广昭战役遗址之类的关键革命遗址执行了保护使用以及表现工程,创建了许多纪念馆与陈列室,通过物品展览,场景还原等各种手段,鲜活地呈现红色历史,传递红色文化。

4.2 红色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

红色旅游既是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关键产业之一,近年来,四川红色旅游发展态势良好,旅游规模不断扩大,慢慢达成了红色旅游同生态旅游等多种业态的深入结合,从而推动红色旅游产业结构得到改良升级。

四川属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地区之列,还是朱德、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乡,更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部分,依靠这样独特的优势,四川的红色旅游有着资源丰厚、特点突出、开发潜力很大等明显特性,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大省。

紧跟省委、省政府有关“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的战略安排,四川在红色旅游革新发展方面收获颇丰,其一,四川大力探寻红色景区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并积极更新且充实红色旅游的教育形式及内容,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虚拟现实(VR),加强现实(AR)之类的技术,使得游客如同亲临其境般体会革命历史场景;开发互动式体验活动,诸如红色主题剧本杀,情景模拟等等,从而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投入感,让红色文化更为鲜活形象地展现在游客眼前。另一方面,把红色旅游同城镇化创建融合起来,用心塑造出一批颇具特色的红色旅游小镇。这些小镇并非仅仅具有红色旅游的功能,其还融入了红色教育研学,观光旅游等诸多元素,比如凭借邓小平家乡旅游区来创建包含红色文化体验,民俗风情表现,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围绕仪陇朱德故里等主要旅游风景区营造省级旅游产业园区,完备旅游相关设施,改善旅游服务水平,促使产业形成聚集效应,从而更好地推进红色旅游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4.3 红色教育研学规模不断扩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革命传统，把这些讲给广大干部群众听，讲给青少年听”，凭借于此，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要依靠红色教育的助力，使得人们牢记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让红色文化如同丝丝春雨一般润泽民众，而在实际生活当中去落实这种红色文化，这才是传承发展红色文化最为根本的目的所在，红色文化践行的重点及关键之处就在于红色文化教育，其毫无疑问属于红色文化传承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部分。

近年来，四川踊跃投入到红色教育研学活动当中，用心雕琢红色教育精品课程，大力推进红色教育全面普及，举办了诸多形式各异，内涵丰富的红色教育活动，使得红色教育的覆盖面得到大幅拓展，在各方齐心协作之下，红色教育事业收获明显成果，各类研学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四川大力推动“讲好红色故事”这项工作，把红色故事传至学校，社区，企业等地，在讲述方面持续革新，借助开展诸如红色文化夏令营之类颇具教育意义的活动，还有红色历史知识竞赛这样的主题活动，使得红色故事能够以一种更为形象，鲜活的面貌出现在大众眼前，从而唤起大众对于红色文化的喜爱之情，令红色文化在代代传承之下重获新生。

5. 四川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优化路径

5.1 发挥党的引领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忠诚继承者和坚决弘扬者，在中国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进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且无可取代的引领作用，党对于四川红色文化传承发展所起到的引领效果，重点表现在理论引领，政治引领，价值引领这三个方面。

5.1.1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凸显党的理论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地表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给文化创建给予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思想武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创建不断向前迈进，文化事业产业蓬勃兴起，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强有力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之下，文化创建可以朝着正确方向稳步行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清楚表明：“唯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一直依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妥善解答时代与实行提出来的重要问题，才可以长久守住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四川红色文化在流传发展进程当中，务必毫不动摇地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引，全面发挥党的理论引导功能，通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办法，深入探究四川红色文化的内涵，特性以及发展规律，从而给四川红色文化的流传发展给予科学的理论支持和行为指南。

5.1.2 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强化党的政治引领作用

意识形态工作处于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紧紧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这对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来说非常关键，意识形态工作就像一盏明灯，给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照亮道路，通过加强政治引领，可以保证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一直走在正确的政治道路上，不会迷失方向。

牢牢掌控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这是搞好四川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核心所在，唯有坚守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才能够促使四川红色文化朝着健康，有序且可持续的方向去发展，从而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赋予强劲的精神支持与文化依托，党要通过制订合理的文化政策，加大文化市场监管力度，塑造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等来保障四川红色文化在意识形态范畴内占据支配地位，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

5.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党的价值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人民共同持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它体现着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客观需求与前行走向,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向既定目标迈进的深层力量,如果缺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建工作,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建就会找不到精神依托,陷入迷茫境地,丧失明确指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本质上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全国各族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四川红色文化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形成局部,从本质上讲它归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范畴,就内涵来讲它深入表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向,代表着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要想传承和发扬四川红色文化,就务必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作核心任务,全面彰显党的价值引领功能,通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入到四川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各个环节当中,促使四川红色文化变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承载者,从而引导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5.2 新兴技术赋能四川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新时代背景之下,要想推动四川红色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从而展现出它独有的魅力,并使其在更大范围之内产生影响,迫切需要加大对各类先进文化表现技术,工具以及手段实施研发的强度,促使相关技术同文化创意相融合并加以更新,以此来优化四川红色文化的流传效果。

5.2.1 新兴技术对四川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探讨

当下,像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AI)这样的新兴技术,可以给受众重新展现那段轰轰烈烈的红色岁月,从而优化红色文化的体验感和影响力,VR技术能够营造出十分逼真的历史场景,让受众感觉自己好像来到了革命斗争的现场,亲自去体会革命先辈们的英勇行为和高尚品德,AI技术凭借智能交互,语音识别等手段,可以给予受众更为丰富,便利的文化体验,使得红色文化以一种越发形象,鲜活的面貌走入大众的生活,所以说,要想推动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务必正确看待新兴技术,并把它们用足用好。

5.2.2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红色文化受众精准定位研究

利用大数据技术来对红色文化受众实施科学分析并精准定位,这是推动四川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部分,通过搜集,梳理以及分析民众接触红色文化期间所给出的反馈信息,可以全方位把握民众对于红色文化内容,宣传手段等各方面的喜爱程度及需求特征,依此制订出具有针对性且具备操作价值的传承发展方案,使得红色文化流传更为契合受众的实际需求,提升其流传成效,而且,云计算技术给大数据分析赋予了强劲的计算能力支持,保证了数据处理既有效率又准确无误,从而为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构筑起牢靠的技术基础。

5.2.3 基于AI技术的红色文化内容推送机制优化研究

AI技术对于四川红色文化内容推送机制的改善有着很大的应用潜能,利用AI技术来处理所搜集到的用户数据,可以精确地塑造起用户画像,从而知晓不同用户各自的兴趣爱好,行为特点等等情况。面向不同的用户群,制订出专属化的四川红色文化内容发送方案,做到精确化发送,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深层次地剖析四川红色文化本质与特性,融入推荐算法实施智能发送,遵照用户给予的回应消息,自行调节发送内容,使得个性化内容发送具备动态性与经常性,符合各类用户在各个时期的文化需求,进而加强四川红色文化的流传范围和影响力度。

5.3 完善专业人才评估机制

科学合理的人才考量机制属于人才培育及引入机制的关键形成单元,就四川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工作而言,由于其对人才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有着较高需求,因而创建完备的专业人才考量机制十分必要。

5.3.1 构建科学化评估体系

评价体系要具有全面性与系统性,包含政治素养,专业知识,专业技术水平等诸多方面,

从而针对专业人才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评价。由于不同层次，不同种类人才的特点及需求有所区别，所以要设置有针对性的评价项目和指标，做到精确评价，就拿从事红色文化研究的人才来说，可以重点考查其学术成果，研究能力以及对红色文化内涵的领悟程度；而对于从事红色文化流传的人才而言，则可以侧重考量其流传技巧，更新能力以及受众回应之类的情况。

5.3.2 确保评估过程的公正性与透明度

要成立单独的专业人才评定机构，以此来保证评定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在评定的时候，需依照已有的规定，按时把评定标准，流程及方法公布出来，主动接受各个方面的监管，防止人为主观因素影响到评定结果，凭借透明化的评定机制，提升评定结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让专业人才可以处于公平，公正的环境之下接受评定。

5.3.3 建立评估反馈机制

评估工作结束以后，要立即掌握专业人才的成长情况及其需求，给他们赋予必需的支撑和援助，把评定结果当作专业人才实施奖惩，升职的关键依据，彰显评价的激发功能，从而调动专业人才的主动性和革新精神，如果专业人才的评价成绩比较好，可以给予物质奖赏，升职机会或者更多的培训资源；要是专业人才的评价成绩欠佳，就要给予专门的指导并给出改善意见，助力其优化自身的专业水平。

5.3.4 人才评估与培养的有效衔接实现

人才评价既是对专业人才当前水平的衡量，也是对专业人才培育成果的考察，所以，在执行评价的时候，要立即把评价结果告知专业人才，给专业人才培育给予有效的参照依照，通过剖析评价所得到的数据，找出人才培育环节当中存在的问题与短缺之处，尽早调整人才培育计划以及课程安排，保证专业人才评价和专业人才培育互相推动，一同发展，促使专业人才培育机制持续改善并逐步完备。

6. 总结

在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时，坚定不移地踏上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属于时代的必然趋势，要继续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现实相融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这是文化发展的核心所在与主要途径，红色文化是这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带领人民达成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先进文化形式，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肥沃的土壤当中，并以此为根基逐步生长起来，已经变成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红色文化加以传承和发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建有着非常重大的价值，是推动文化兴盛发展的重要步骤。

四川红色文化属于中国红色文化版图里的关键一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深沉的精神意蕴，细致探究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厚重的理论价值，可以给有关学术领域带来崭新的视野与想法，而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促使地方文化事业蓬勃向上，为创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添一份力量。依托于此，本研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建以及“两个结合”的现实需求出发，针对地方红色文化创建展开探讨，重点关注四川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相关问题，并予以深入探究，力求全方位且精确地把握四川红色文化的科学内涵，系统而深入地梳理四川红色文化的研究情况及其发展脉络，从而给进一步推进四川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赋予牢靠的理论支持和操作指引。

参考文献：

- [1] 徐黎. 四川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4, 43 (10): 34-38.
- [2] 王雪玉洁. 四川红色文化的艺术传播策略探究 [J]. 四川教育, 2024 (12): 23.

-
- [3] 马登校, 王昆鹏. 四川红色文化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 [J]. 今传媒, 2024, 32 (12): 128-131.
 - [4] 沈鑫, 杨成, 朱香瑜, 陈阳. 新时代四川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传承的体教融合路径研究 [J]. 新传奇, 2024 (36): 66-68.
 - [5] 黄涛, 陈熙隆, 何先成. “三全育人”视角下红色文化引领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 [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24, 34 (06): 7-20.
 - [6] 王录伟, 马慧敏, 赵小林. 红色精神赋能: 四川红色文化在饲料企业管理创新中的路径探索 [J]. 畜牧产业, 2025 (01): 37-43.
 - [7] 翟启兵, 魏桂圆.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的艺术表达与跨媒介设计研究 [J]. 丝网印刷, 2024 (23): 110-112.
 - [8] 陈强. 四川民族地区红色文化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24, 43 (05): 35-39.
 - [9] 谢尚芸.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重要论述的在地化实践——基于四川红军长征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现状研究 [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04): 57-64.
 - [10] 朱旋旋. 全媒体时代四川红色文化传播创新研究 [J]. 声屏世界, 2025 (03): 5-7.
 - [11] 钟学娥. 数字化背景下四川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路径研究 [J]. 科学咨询, 2024 (20): 96-99.
 - [12] 刘倩, 张强, 孔超. 四川红色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J]. 玩具世界, 2025 (03): 95-97.
 - [13] 范雯. 城市文化形象建构视角下四川红色旅游城市宣传文本英译研究 [J]. 漫旅, 2024, 11 (16): 61-63.
 - [14] 谭江玲, 叶文明. 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在高中生政治认同培育中的运用探究 [J]. 成才之路, 2025 (01): 33-36.
 - [15] 韩洪泉. 红色文化视域下的四川与长征 [J]. 长征学刊, 2024 (03): 21-34+107.
 - [16] 马志雪. 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及在高校育人的应用路径研究 [J]. 新传奇, 2024 (27): 66-68.
 - [17] 王佳, 喻瑾. 四川红色文化融入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路径探索 [J]. 文科爱好者, 2024 (04): 14-16.
 - [18] 宋俊敏. 生态人文理念下四川长征主题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D]. 成都大学, 2024.
 - [19] 黄浩. 四川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D]. 四川师范大学, 2024.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ichuan'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KE Xianfei

(Mogilev State University, Mogilev 212022, Belarus)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stood at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equently emphasizing the strategic need to make good use of red resources and inherit the red bloodline. It has also implemented systematic planning for how to inherit red culture in the new era. Sichuan Province is a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hat the Red Army passed through the widest area and the longest time during the Long March. It is not only a key area of the Sichuan-Shaanx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but also contains a unique "genetic code" of red culture. It retains complete traces of the Long March spirit, and in the process of founding New China, it has given birth to many spiritual lineages such as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and the spirit of earthquake relief, thus forming a red cultural matrix that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Under the tide of history, Sichuan's red culture has been marked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and the Dadu River have built revolutionary monuments,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has laid a strategic foundation, the national defense miracles have been shocking, and the people have united as one in earthquake relief. Sichuan's red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in sync with the pulse of the times. This cultural form, which not only inherit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but also bear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not only adds 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perseverance and dedication to Bashu culture, but also demonstrates unique value in the vivid practice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It is a local symbol carrying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Chinese Communist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ichuan's red culture will provide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ly strong province, and also offer local wisdom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demonstrating the vigorous vitality of red gen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Red culture; Sichuan's red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张瑞艺术歌曲艺术特征与演唱分析——以《诔词》《苏苏》为例

夏艳茨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论文以张瑞艺术歌曲集——《雪花的快乐》中两首艺术歌曲为例, 对张瑞艺术歌曲的艺术特征与演唱进行研究分析。《诔词》和《苏苏》两首艺术歌曲有着独特的魅力, 歌曲将诗与乐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笔者结合文献和谱例分析, 对《诔词》、《苏苏》的创作背景、艺术特征进行分析, 结合自己在学习和演唱这两首作品中的理解和体会, 对两首歌曲进行演唱分析。为今后学习这首两首作品的同学提供一些建议或参考。

关键词: 张瑞; 艺术特征; 演唱分析; 哀词; 苏苏

1 简介及创作背景

作曲家就职于天津音乐学院, 担任作曲指挥系副教授, 她在1990年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 在1995年毕业后留任。2001年到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和声与钢琴艺术指导。张瑞老师在2009年出版的艺术歌曲集《雪花的快乐》这部歌曲集共收录了16首歌曲。

1.1 《诔词》创作背景

《诔词》是由马修·阿诺德所创造的一首诗歌, 这部作品后由徐志摩先生在1925年翻译为中文诗。在20世纪初, 随着“五四运动”的推动, 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 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诔词》描述了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在苦难中的挣扎、悲伤和人们对于友人逝去的悲痛, 借此表达了对民族苦难的思考。

1.2 《苏苏》创作背景

《苏苏》是由徐志摩先生在1925年创作的诗歌。这部作品创作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 歌词取材于诗人的文学作品。采用极具浪漫主义风格的“想象”和“虚拟”的手法夸张拟物。以“野蔷薇”为线索串连起“苏苏”一生的经历和遭遇, 用“蔷薇”来描绘苏苏生前的美好, 以及她遭受摧残和死亡后灵魂的寄托之处。

2 张瑞艺术歌曲艺术特征

《张瑞艺术歌曲集》主要是以抒情类的歌曲为主, 把诗歌和音乐旋律相结合, 张瑞老师把诗歌中的意境表达的淋漓尽致。

张瑞老师在创作艺术歌曲时: a. 注重旋律的柔和、连贯, 多运用长连线把音乐连贯起来, 也擅长利用转掉来释放情绪。

b. 歌曲的语气感, 以音乐为主, 用诗歌的语气来进行创作。

c. 音乐的起伏和情感的推动。在作品中多采用三连音和六连音等节奏型使用将音乐推向高潮让情感得到爆发。

作者简介: 夏艳茨(2003-), 女, 硕士研究生, 音乐专业, 研究方向为音乐。

2.1 《诔词》艺术特征

2.1.1 诗词与旋律

《诔词》第6、7乐句的“散上玫瑰花”其中“散”渲染出悲伤、凄凉的氛围，把“玫瑰花”比作对友人逝去的哀悼，两句歌词相同但旋律不同，歌词采用“一字对一音”的形式，旋律的递进，推动着歌唱者情绪发生变化，在第6乐句中“#5”这个变音是点睛之笔，与后一句的旋律形成对比，奠定了整个歌曲的情绪，同时用长连把情绪延长。（谱例1-1）

第10、11乐句表现了作者希望又人可以得到解脱，不再遭受痛苦，第10乐句使用了大附点节奏，使诗歌与音乐，形成有机统一。紧接着“化”运用八分音符休止停顿表达了作者的感叹，随后“啊”字进一步升华了悲伤感。（谱例1-1）

散上玫瑰花， 散上玫瑰花， 休拂杂一小枝的

水松！ 在寂静中她寂静的解化； 啊！ 但愿我亦永

谱例 1-1

作品中“终”“净”“苏”和“醒”都运用了线条和延长音进一步延续了悲伤之情，这与词作者创作中所用的尾部押韵相结合。

在B乐段开始情绪出现转折。“在火热与冰冷的迷雾中旋转，旋转她的一生。”歌词“热”与“冷”形成鲜明的冲突，可以看出逝者当时的处境，一直盘旋没有方向，直到她人生的尽头。采用连续的三连音表现出急促之感。33-34小节表现了逝者希望得到平静安宁的生活，大附点音符和长音延续了这一悲伤的情绪。（谱例1-2）

火 热 与 冰 冷 的 迷 雾 中 旋 转， 旋 转 她 的 一 生。
但 和 平 是 她 灵 魂 的 愿 望， 和 平 是 她 的
愿 望。

谱例 1-2

在 A' 乐段中突出了作者对友人的思念，点明主旨。46-47 小节中运用八分休止断开表现出了作者的哽咽。最后一句“她独自攀登，那死的插天的高楼”描绘了逝者生前独自抵抗层层障碍，第 49 小节“插”为其中的变音，这个变音与开头相呼应，并采用长连线，把悲伤之情延续。（谱例 1-3）

享 受 呼 吸 的 自 由； 今 夜 在 这 静 夜 她 独 自
的 攀 登， 那 死 的 插 天 的 高 楼。

谱例 1-3

2.1.2 曲式结构与伴奏织体

《诔词》是 4/4 拍，速度为 Andante（行板），暗淡的 a 小调歌曲，歌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曲式分析图式（如图 2-1）：

《 <u>沫词</u> 》曲式结构图式						
单三部曲式						
一级曲式结构	引子	A	连接	B	连接	A ₁ 尾声
起止小节数	1~5	6~23	24~26	27~34	35~40	41~45 52~54
二级曲式结构	a b c c d		e e ₁		c ₁ d ₁	
小节数	4 4 1	4 4	3	4 4	6	5 6 3
调式调性	a 小 调					

谱例 2-1

A 乐段（第 1-23 小节）：属于单一调性乐段，第 1-5 小节为引子部分，高声部使用一音对多音的、呈连线的形式。高低声部形成呼应，伴奏织体则为分解式和弦上行级进，多种和弦交替进行，使得音乐更加丰富更具空间感。



谱例 2-2

a（第 6-9 小节）、b（第 10-13 小节）、c（第 15-18 小节）、d（第 19-23 小节）中间添加了一小节连接乐句，整体多用旋律线条串连，不断的推动情绪。伴奏织体高声部多为柱式和弦，起烘托作用。低声部则为分解和弦，推动着歌唱者的情绪。A 乐段中“苏”和“醒”用延长音延续了情感，“醒”最后以主和弦根音结束，形成首尾呼应。

谱例 2-3

B 乐段（第 27-34 小节）在呈示部基础上引入新的材料，运用动机式展开继续发展与 A 乐段形成鲜明对比。用连续三连音，穿插附点节奏，使音乐变得急促突出作者的情绪。伴奏织体高声部为三连音柱式和弦推动歌唱者的情绪的释放，体现了悲愤交加的情感。

A' 乐段（第 41-51 小节）再现部使用了重复、变奏等发展手法。46-47 小节伴奏织体的低声部与旋律声部的休止错位进行，仿佛形成“对话”的形式，表现出作者对友人的哀悼和思念。第 48 小节“攀”字为全曲最高音，用了 forte（强）的力度将悲伤的情绪渲染到极致，最后一句中“高”和“楼”与 A 乐段的“苏”和“醒”一样运用延长音延续情感，结束音落在根音上，形成首尾呼应。（谱例 2-4）

谱例 2-4

2.2 《苏苏》艺术特征

2.2.1 诗词与旋律

第 5-8 小节作者把“蔷薇”比作“苏苏”，描绘出“苏苏”生前美丽的风姿。用#4 刻画出作者对“苏苏”的惋惜。“像一朵野蔷薇”连线和后一句断开，突出了“苏苏”高洁美丽的艺术形象。（谱例 3-1）

谱例 3-1

第 10-14 小节用“暴风雨”指代世俗的风言风语和她所经历的无数苦难和挣扎。张瑞老师用离调推动情绪递进，第 13 小节转到 A 自然大调，与前一段旋律形成对比，用大调营造出荒凉与作者强烈的悲伤，采用长连线将情绪推起来。（谱例 3-2）



谱例 3-2

第 23-24 小节“啊，那蔷薇是痴心女的灵魂”运用拟人的手法将蔷薇拟人化，赋予人的灵魂。作曲家用 *a tempo*（原速）和变音记号来塑造“苏苏”对爱情的纯真和高洁的品质。



谱例 3-3

第 25-32 小节“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润，到黄昏时有晚风来温存，更有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前两句运用对偶，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并运用了复辞的手法。用转调来突出作者对美好感情的向往和爱情对“苏苏”的救赎。变音记号来表现“苏苏”对爱情生活的描绘。（谱例 3-4）



图 3-4

第38-44小节张瑞老师用长连线回到最初的情绪，但又多了一层感叹。使用八分音符附点，明显的停顿与前面平稳诉说形成对比，暗示“苏苏”的悲惨结局，同时也让听众心境跟随音乐的起伏。（谱例3-5）

谱例 3-5

2.2.2 曲式结构与伴奏织体

《苏苏》为4/4拍，速度为Largo（广板），a和声小调和A和声大调相互转化的歌曲。歌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A-B-A'）。曲式结构分析图式（如图4-1）：

《苏苏》曲式结构图式						
单三部曲式						
一级曲式结构	引子	A	B	连接	A'	尾声
起承转合小节数	1~4	5~22	23~33	34~37	38~47	48~50
二级曲式结构	a a' b c	d e f			a' 9	
小节数	4 4 5 5	2 2 7		4	4 4	2
调式调性	a和声小调	A自然大调	A自然大调		a和声小调	

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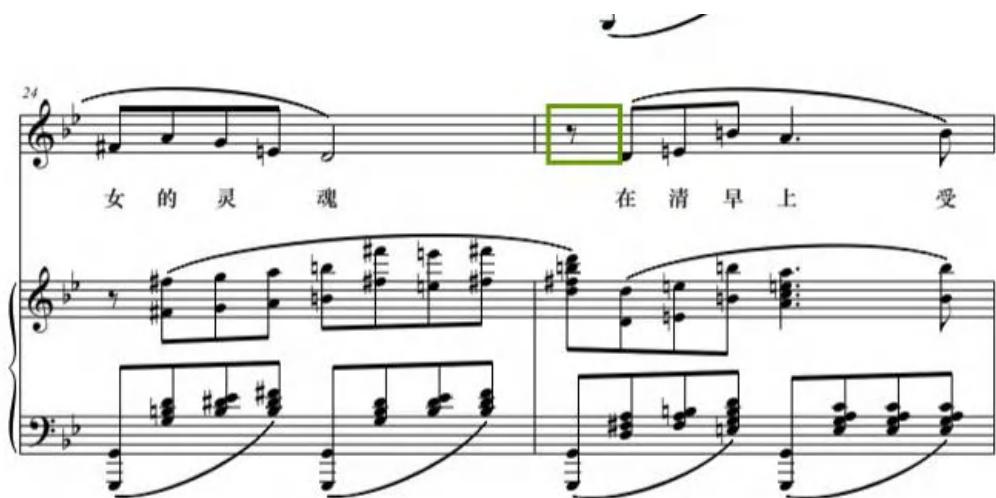
A乐段（第1-22小节）：第1-4小节为引子部分，运用变化重复，以a和声小调主和弦开始，并标有表情记号（伤惋的）。主和弦的根音加入大二度，尖锐的音色让听众提前进入到“伤惋”的意境之中。a（第5-8小节）、a'（第9-12小节）、b（第13-17小节）、c（第18-22小节）使用了起承转合展开，a乐句沿用了引子部分的柱式和弦延续了伤惋的情绪，增添了旋律的色彩。a'乐句的旋律和a乐段基本一致，但伴奏织体高声部回到高音谱号运用了分解和弦与a乐句形成比，同时起到上下乐段的衔接作用。b乐句使用离调和

mezzo-forte (中强) 形成转折，在 16-17 小节又转回到主音上，为进入 c 乐句做铺垫。A 乐段结构为非方整性结构。（谱例 4-2）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three staves of music. The top staff starts with a dynamic of *ff* (fortissimo). The lyrics are: 暴风雨 摧残了她的 身世 (Bitter rain destroyed her life). The middle staff starts with a dynamic of *mf* (mezzo-forte). The lyrics are: 这荒草地里有她的墓碑 (There is her tombstone in this wasteland). The bottom staff starts with a dynamic of *ff*. The lyrics are: 淹没在蔓草里 她的伤悲 (Buried in the weeds, her sorrow). The third staff starts with a dynamic of *ff*. The lyrics are: 啊 这荒土里化生了血染的蔷薇 (Ah, in this wasteland, the blood-stained rose was born). Green boxes highlight specific notes in the music, corresponding to the lyrics.

谱例 4-2

B 乐段（第 23-33 小节）：引入新材料形成对比，将音乐情绪推向高潮。d（第 23-24 小节）速度回到原速，伴奏织体呈下行，e（第 25-26 小节）开头的弱起，为点睛之笔，为整首乐曲增添了层次感和变化。f（第 27-33 小节）开头使用渐强符号结束运用阻碍终止。（谱例 4-3）



谱例 4-3

A' 乐段（第 38-47 小节）：开头以中弱和间奏完美连接，并沿用了 A 乐段的材料，使用同头换尾的手法，42 小节八分休止突然的停顿，暗示“苏苏”的悲惨命运。伴奏织体高声部用柱式，低声部运用琶音延续营造悲伤的意境。阻碍旋律终止，使乐句更加完整流畅。尾声的休止让听众沉浸在伤惋的情绪之中。（谱例 4-4）



谱例 4-4

3 张瑞艺术歌曲演唱分析

《张瑞艺术歌曲集》在演唱形式上要注重诗歌的朗诵和断句，演唱过程中为了歌曲的连贯性和情绪的爆发，要会控制自己的气息，注重音乐的延续性；咬字都需要快速归韵；诗歌与音乐情感的统一。

3.1 《诔词》演唱分析

3.1.1 气息运用

两句“散上玫瑰花”歌曲以中弱开头娓娓道来，在气息上要注意连贯、平稳，与情绪相互配合表达出作者对逝者的哀伤之情。后一乐句是前一乐句的递进。“这回她安眠了，不在苏醒”歌词明确表达友人的逝去，音阶呈下行要平稳气息。用慢吸的状态带出伤感的意境，长音要保持平稳。

“在火热与冰冷的迷雾中旋转，旋转她的一生。”作曲家用三连音来表达出急促之感，抒发诗人激动、悲愤的情绪。演唱者在这一乐段要注意采用深吸气息的方式，稳住气息，不能跟随伴奏的急促感乱了呼吸节奏。

“局促在人间她博大的神魂啊”在“她”字换气，气息往下沉把激动的情绪放缓回到平稳，将伤心的情绪凸显出来。“今夜在这静夜”声音要暗淡一点，带动气息利用钢琴伴奏，演唱出与友人对话的感觉。“她独自的攀登”这句中“攀登”二字，为全曲最高音，并运用了渐强渐弱，因此气息要往下扩张拉着声音。

3.1.2 咬字吐字

在“花”“松”“终”“苏”“醒”等字在延长音上，要注意快速归韵，归到韵母“a”“ong”“u”“in”中，口腔要保持打开位置要高。“但倦了时她的心”中“她”字要提前挂高位置，气息往下拉住，字头“t”时值拉长一点，强调出作品的主人公。“在火热与冰冷的迷雾中旋转，旋转她的一生。”采用三连音速度较快。“在”字时值较长且有连线连接，可以把“z”字头咬死一点，韵母延长让情绪充分释放与后续快速形成一定对比。

“但和平是她的愿望，和平是她的愿望”前一句和说话一样去演唱，后一句咬字松开仿佛作者喃喃自语一般。

在演唱“她独自的攀登”时要注意“攀登”的“攀”字，在咬字时，要把嘴张开抬高上颤，喉头向下保持，稳住气息，让情绪充分释放。“那死的插天的高楼”可以根据情绪做渐慢，但要注意把握节奏不可太拖沓。“高”字快速归韵到“ao”跟着轻咬“楼”字，保持位置和气息向远处慢慢收掉声音。

3.1.3 情感分析与表达

两句“散上玫瑰花”要带入悲伤的情绪，后一句相较前一句要更激动，随着“休搀杂一小只的水松，在寂静中她寂静的解化”描绘出友人逝去的场景和作者内心的悲伤。

“在火热与冰冷的迷雾中旋转，旋转她的一生。”情绪要激动起来，在三连音的推动下唱出作者的悲愤之情。描绘出友人面对两难的处境，一直盘旋直到最后逝去。最后一句“和平是她的愿望”重复前一句，描绘友人对和平的渴望和作者对于友人没有实现愿望的惋惜。

“局促在人间她博大的神魂啊 何曾享受呼吸的自由”中表现了友人受到的不公以及作者对友人逝去的不甘。“今夜，在这静夜”的休止符，留白用伴奏补充，形成对话的形式，表现出作者对友人逝去的感叹。“她独自的攀登”“攀”字将作者对于逝者离世和对社会不公的情绪爆发出来。

3.1.4 舞台表演实践

在引子部分是要注意进入情绪，在每一乐句换气之前提前半拍做出准备。在A乐段诉说时，眼神中要带有悲伤的感觉，“休搀杂一小枝的水松！”可以加入拿水松的动作，将语言具像化。“啊！但愿我亦永终”中“啊”字采用叹气演唱，也可以加入叹气的动作，“我”可以把手抬起放在胸前，带入角色。B乐段要与前一段的情绪又对比，动作和眼神要变得坚定，表现出悲愤的情绪，三连音和小连线的急促感都要表现出来，身体也要跟随着情绪来做出动作，但身体不能紧，松开，带动听众的情绪跟随音乐一起起伏。在最后的A’部分，回归平静也要做得自然，在间奏部分切换情绪，最后一句“高楼”可以眼神眺望，伸手去够高楼，把听众留在悲伤的意境之中。

3.2 《苏苏》演唱分析

3.2.1 气息运用

“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淹、里”都在重拍上，演唱时气息要往下走，音区低也要挂上高位置。“啊 这荒土里化生出了血染的蔷薇”这一句要连贯，不能换气，“啊”字就要把气息叹下去，唱出“苏苏”坚忍不拔的品质。

“到黄昏时有晚风来温存，更有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这两句连接紧密，需要大量气息，所以在“存、安”字换气时要注意快吸沉下去，但又能打破旋律线条。

“你说这应分是她的平安，但这命又叫无情的手来攀”沉浸在伤惋的情绪当中，如说话一样娓娓道来“苏苏”命运的悲惨。“可怜啊”后的休止符暗示了“苏苏”的命运，气息要断干净。“摧残”运用慢吸慢呼的方式唱出悠远、伤惋地意境。

3.2.2 咬字吐字

“苏苏是一个痴心的女子，像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描绘出着“苏苏”生前的美好形象，音色要柔和一点，牙关不能咬太死，口腔保持打开说话。“这荒草地里有她的墓碑”咬字要与其他部分有所区别，12小节暗示了音乐离调所以情绪也会有所不同，“她”“墓”字在“t、m”声母上咬死一点，在韵母上松开，稍带一点哭腔。“啊那蔷薇时痴心女的灵魂”咬字要注意张弛有度，“啊”要用弱高音，把空间感拉开，咬字要带一点哼鸣，但是“蔷”则要把“q”字延长，快速归韵到“ang”。“可怜啊”在平时说话中“啊”会被延长，在谱例当中则运用了休止断开，因此这一乐句不能采用平时说话的习惯，要及时断开唱出作者的哽咽。

3.2.3 情感分析与表达

开头运用伤惋的情绪为“苏苏”的悲惨经历做出铺垫，“苏苏是一个痴心的女子，像一朵野蔷薇她的风姿”把蔷薇喻作苏苏，让“苏苏”高洁的品质和“苏苏”悲惨故事形成对比，演唱时要为听众描绘出“苏苏”生前美好的形象以及她身世的悲惨，让引起听众共鸣。

“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润，到黄昏时有晚风来温存，更有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描绘了“苏苏”对爱情的向往，并借用离调来突出爱对“苏苏”的救赎。在演唱时要唱出“苏苏”的美好向往，平淡而美丽，形成画面感。

“可怜啊，苏苏她又遭摧残。”在演唱时利用气息和咬字表达出作者对于“苏苏”悲惨结局的无力感和悲伤。最后这两句表达了作者对于命运不公和“苏苏”这一美好的人生被打破的不甘和控诉。

3.2.4 舞台表演实践

在开头引子部分以伤惋的情绪带入，唱出“野蔷薇”的高洁，把自己代入到叙述者的角色。在A乐段“像一朵野蔷薇的丰姿”可以在“丰姿”加入动作使歌词更加具体，为第13-16小节的离调做出铺垫，跟随旋律做出渐强和渐弱的处理。“这荒草里有她的墓碑”可以往前走一步，表情要表现出悲伤。在B乐段就需要形成对比演唱出不一样的情绪，把情绪调动起来，唱出“苏苏”对爱情美好生活的向往，“到黄昏时有晚风来温存”可以把双手张开做出感受晚风的动作；“更有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头往上抬一点，眼睛稍微向上瞭望。眼神要有希望，面部要带有微笑。在A’乐段中要描绘“苏苏”的向往后回到现实，“可怜啊苏苏她又遭摧残”演唱时双手往前伸，伴随脚步上前，跟随休止符停住，然后在音乐中缓缓把手放下。注意音色不能太过明亮，作品整体的情绪都是伤惋的，要给听众营造出伤惋、无奈的氛围。

4 结论

有本论文通过研究分析张瑞艺术歌曲的艺术特征与演唱分析，了解到张瑞老师在谱曲方面十分注重诗与乐的融合，及情感的表达，让诗歌富更独特的魅力。徐志摩先生的诗歌配上

张瑞老师的谱曲呈现出了这些优美的作品,诗与乐的结合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分析这两首歌曲发现,张瑞的艺术歌曲风格都比较偏伤感;其次在作曲中喜欢运用长连线保持音乐的连续性,形成完整的音乐线条,并借此营造出歌曲的意境,让听众可以更深刻的感受歌曲所蕴含的情感;此外用休止符来突出音乐的情绪,更能表现出作者的情感。歌曲旋律将民族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巧妙融合,《诔词》的古朴与《苏苏》的细腻婉转都是作曲家的独特之处。张瑞老师在编创时保留了诗歌原情感,因此我们无论是演唱还是对歌曲的分析、理解都需要仔细观察,要从诗人的角度出发,把自己当成曲中人去感受其中所要传达的情感,把握情绪的变化。在之后的研究中也要仔细去观察与作品有关的文献和零碎的细节,汲取前人的经验,更深入的理解作品所要传达的内涵。

张瑞艺术歌曲为当代作曲家提供了宝贵的创作思路,也为演唱者拓展了表演的空间。最后,愿笔者的研究可以对研究张瑞艺术歌曲的同学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

参考文献:

- [1] 卢薇.徐志摩诗歌的音乐化[D].西南大学,2014.
- [2] 刘新锋.艺术歌曲《诔词》的音乐特征和演唱分析[D].河南大学,2016.
- [3] 戴莹.徐志摩诗歌题材艺术歌曲的表演美学内涵探微[D].杭州师范大学,2022.
- [4] 陈茹琪.张瑞艺术歌曲的音乐分析及演唱研究[D].江苏师范大学,2022.
- [5] 王睿.艺术歌曲《诔词》的艺术特征及演唱分析[D].聊城大学,2022.
- [6] 叶雯.艺术歌曲《苏苏》的诗乐表达与演唱诠释[D].福建师范大学,2022.
- [7] 马光辉.论艺术歌曲《诔词》的音乐与演唱[D].西北民族大学,2022.
- [8] 岳阳.徐志摩诗词艺术歌曲《诔词》艺术特征和演唱分析[D].齐鲁工业大学,2023.
- [9] 刘慧敏.张瑞艺术歌曲创作的诗乐关系[D].太原师范学院,2023.
- [10] 彭梦月.张瑞四首艺术歌曲的演唱分析[D].河南大学,2023.
- [11] 刘琪.艺术歌曲《苏苏》的艺术特征与演唱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24.
- [12] 付可以.艺术歌曲《歌》《诔词》的演唱分析[D].山东师范大学,2024.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inging Analysis of Zhang Rui's Art

Songs - Taking "Lei Ci (Eulogy)" and "Su Su" as Examples

XIA Yanci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wo art songs from Zhang Rui's art song collection The Joy of Snowflakes as example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inging of Zhang Rui's art songs. The two art songs "Lei Ci (Eulogy)" and "Su Su" possess unique charm, skillfully integrating poetry and music. Combin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music score analysi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Lei Ci (Eulogy)" and "Su Su".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in learning and singing these two works, a singing analysis is conducted.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or references for students who will learn these two work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Zhang Rui;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Singing Analysis; Lei Ci (Eulogy); Su Su

白俄罗斯版权制度的法律属性研究：基于民事立法体系的考察

张荣燚

(莫吉廖夫国立大学, 白俄罗斯 莫吉廖夫 212022)

摘要：在市场关系与知识经济背景下，版权保护对于保障创作者权益、促进社会创新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本文以《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与《版权及相关权法》为核文本，探究白俄罗斯民事立法体系中版权的法律属性。文章系统梳理了版权立法的历史演进，分析了其在现代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定位，指出版权及相关权构成知识产权法下由基本法与专门法共同规制的两个子制度。论文着重探讨了版权的主体、客体，以及作者所享有的人身非财产权与财产权（专有权利）的内涵、特征与保护机制。研究表明，白俄罗斯版权制度体系已较为完备，但在应对新技术挑战、细化权利制度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白俄罗斯；版权；民事立法；法律属性；知识产权

1. 引言

市场关系的确立使得商品竞争力保障、消费者利益保护，尤其是新创意、技术及艺术设计方案开发者利益的保护等问题成为焦点^[1]。在全球知识经济逐步形成的背景下，世界生产的基础与结构正在发生渐进式变革，高技术产品及无形资产（作者作品）在生产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受上述进程影响，现代经济管理需考量知识产权的贸易属性、市场的专利法律特征，并依托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与维权工具展开。

当前，关于文学（科学、艺术）作品、表演、录音制品及广播组织或有线广播组织传输内容的创作与使用关系，由效力层级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条款进行规制。此类文件中，核心法律文件包括：经修订的《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以及《版权及相关权法》^[2]。《民法典》确立了版权及相关权的一般规则，《版权及相关权法》则对因文学（科学、艺术）作品、计算机程序、数据库、表演、录音制品及广播组织或有线广播组织传输内容的创作与使用而产生的全部社会关系，进行了详尽规制。尽管版权的发展历史颇为悠久，但白俄罗斯共和国在该领域的国内立法构建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内版权立法体系也自此逐步形成^[20]。2023年生效的新版《版权及相关权法》标志着立法进入新阶段。然而，该法律仍需进一步完善。首要原因在于，近年来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对“新型客体”的保护成为必要，也带来了版权及相关权客体使用的新方式与侵权风险。

上述关于立法完善的必要性分析，共同决定了本研究主题具有现实意义。据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白俄罗斯共和国民事立法体系中版权的法律属性。为实现此目的，需完成以下任务：1. 界定版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2. 探讨版权的主要客体与主体，以及与版权使用和保护相关的民事法律关系。

2. 白俄罗斯共和国民事立法体系中的版权

2.1 版权领域立法史

作者简介：张荣燚（2000-），男，本科，研究方向为国际法。

版权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长期演变形成的。印刷术的出现与广泛应用通常被视为版权发展的动因。1710年通过的《安妮女王法令》是首部赋予作品出版商复制与传播权的立法文件，标志着版权从特权体系向现代版权制度的转变。

在俄罗斯帝国时期，版权最初与审查立法存在紧密关联。1828年，《审查章程》中新增了专门章节，这是首部赋予作者自行使用其文学作品权利的法律。1911年3月20日通过的《版权条例》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事件，体现了当时西方国家在版权领域的最新立法趋势^[3]。苏联时期，与作者权利相关的关系主要由《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基本条例》、各加盟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版权”章节及大量关于作者稿酬的决议规制。尽管苏联的上述立法文件在版权领域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它们完全符合苏联行政命令体制的需求^[4]。

白俄罗斯共和国版权及相关权立法发展的现代阶段始于独立后。1996年5月16日通过的《版权及相关权法》不仅确立了规制白俄罗斯法律实践中已有客体相关关系的新路径，还首次对以往立法中未提及的客体相关关系作出了规制。该法律彻底重构了版权领域法律关系的规制体系，并从法律层面确立了相关权制度。最新阶段是《白俄罗斯共和国2023年1月9日第243-Z号法律》，即修订后的《版权及相关权法》的通过^[5]。

2.2 现代阶段版权的概念与定位：法律规制

版权是调整科学、文学、艺术及其他智力活动领域关系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规范的总和。在民事权利理论中，主流观点认为，规制因文学、科学、艺术作品及表演、录音制品、广播组织或有线广播组织传输内容的创作与使用而产生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共同构成了独立的法律制度——版权与相关权制度。

版权立法的基础是《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该条款保障艺术创作和科学创作自由，并规定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6]。知识产权保护的宪法条款在民事立法框架内得以实施。根据《民法典》第一条，民事立法界定了知识产权产生的依据及行使的程序。《民法典》第七条将科学、文学、艺术作品及其他智力成果的创作列为民事权利与义务产生的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八条则将知识产权成果的专有权利列为民事权利的客体^[7]。

《民法典》确立了版权及相关权的一般规则（界定了知识产权法这两个子制度的规制对象、适用范围及客体）。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根据《民法典》制定的《版权及相关权法》及其他立法文件，对因科学、文学、艺术作品（版权客体）的创作与使用而产生的关系进行规制。Л. М. 维什涅夫斯基认为，将版权与相关权规范纳入同一立法文件，是由这两个法律子制度的紧密关联性决定的——这种关联性体现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及广播组织权利的从属性，因其行使需遵守作品版权^[8]。

从部门法属性来看，《版权及相关权法》的条款属于民法范畴。从制度层面而言，其条款属于知识产权法，而知识产权法被视为民法的一个独立分支^[6]。《民法典》第五编“知识产权成果的专有权利（知识产权）”中包含部分版权与相关权条款，其第六十章“一般规定”（第979~989条）包含适用于所有知识产权客体的条款，第六十一章“版权及相关权”（第990~995条）则专门规制版权与相关权客体。然而，白俄罗斯国内立法未在《民法典》中对所有问题进行规制，《民法典》仅规定了一般性规则，具体规则则由专门的《版权及相关权法》规定。根据《民法典》第三条，其他法律中包含的民事权利条款必须符合《民法典》；若存在冲突，应优先适用《民法典》条款^[9]。

此外，白俄罗斯共和国积极参与版权领域的国际合作，是《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等国际条约的成员国，确保了国内立法与国际标准的接轨。

3. 作者权利与版权保护

3.1 作者的人身非财产权

白俄罗斯国内立法基于版权的传统二元论认知。《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二条规定，智力成果的作者享有人身非财产权与财产权^[10]。

人身非财产权具有与作者人身的紧密关联性，这决定了其不可转让性与不可处分性。《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二条规定，人身非财产权独立于财产权，即使作者对智力成果的财产权转让给他人，人身非财产权仍归作者所有。该权利的非财产权性决定了其法律保护的特殊性：若人身非财产权受到侵害，权利人无法要求侵权人赔偿财产损失，但可要求赔偿由此造成的精神损害。《民法典》第九百八十八条第2款及《法律》第二十条第1款规定，人身非财产权受永久性保护。法学界认为，作者去世后，人身非财产权不再作为主观权利存在，而是作为需予以认可与保护的社会利益受到保护^[11]。

《法律》规定作者对其作品享有以下人身非财产权：署名权、姓名权（决定以真实姓名、笔名或不署名方式使用作品）、作品完整权（禁止对作品进行任何修改、删减或补充）、发表权以及收回权^[12]。此外，除作品完整权外，立法还规定作者有权反对任何歪曲其作品的行为，以及任何可能损害其名誉或声誉的其他侵害作品的行为。

署名权传统上被界定为法律保障主体被认定为作品作者的资格。立法规定，仅通过智力劳动创作智力成果的主体，方可享有署名权。《法律》第八条第2款规定了该规则的例外情形：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作品原件或复印件上标明的主体被推定为作者。立法规定“任何旨在放弃作者人身非财产权的协议均无效”，这意味着若协议约定作者不得行使或保护其某项人身非财产权，则该协议自成立时起即无法律效力。

3.2 作者的财产权

《法律》第十六条界定了受保护作品财产权的内容。财产权包含作品专有使用权，以及可归属于作者的其他财产权。《法律》赋予作品作者（或其他版权持有人）专有使用权。专有权利是一类独立的民事财产权，权利人有权依据该权利的内容，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使用受保护的智力成果，同时有权禁止他人实施类似行为，从而提供了对受保护智力成果使用的合法垄断权。

作为独立民事权利类型，专有权利具有财产权属性、绝对性、时间性与地域性特征。其绝对性意味着，所有不特定主体均负有不得侵害该权利的义务。B. A. 多佐尔采夫将专有权利的功能界定为保障智力成果的特定化并构建符合其非物质客体特性的流通机制^[13]。

在作者权利体系中，专有权利占据核心地位。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八条，专有权利是独立的民事权利类型。然而，不能将“专有权利”与“财产权”视为完全等同，因为作者除专有权利外，还可能享有其他财产权（如追续权）。因此，《法律》第十六条中使用的“财产权”是上位概念。《法律》第十六条第2款以非穷尽方式列举了作者可自行实施或许可他人实施的主要行为，包括：作品复制、发行、出租、进口、公开展示、公开表演、广播传输、有线传输、翻译、改编及其他可能使用方式。

3.3 作者权利的保护

《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获得司法保护^[14]。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二条，知识产权客体的法律保护基于其创作事实产生。《版权及相关权法》第四十条第1款规定，版权及相关权专有权利的持有人可依据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及其他机关请求权利保护。

A. II. 谢尔盖耶夫将保护权界定为赋予权利人采取保护性措施，以恢复其受侵害或被争议权利的资格。版权及相关权的保护被界定为旨在恢复或确认版权及相关权，并在权利受

侵害或被争议时保护权利人利益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22]。《民法典》规定的民事权利保护方式包括：权利确认、恢复原状、停止侵害、自力救济、精神损害赔偿等。《版权及相关权法》第四编专门规定了人身非财产权与财产权的保护。侵害版权及相关权将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22]。

侵权行为包括：未经授权使用客体制作侵权复制品；规避技术保护措施；删除或修改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等^[14]。权利人有权主张权利确认、停止侵害、损害赔偿、以侵权人获利替代赔偿，或由法院在法定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等。法院可裁定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及相关设备。

精神损害赔偿是保护中的重要问题。《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若因侵害人身非财产权或其他非物质利益的行为导致公民精神损害（身体或精神痛苦），或存在立法规定的其他情形，公民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该精神损害。”但在版权领域，《法律》未直接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通常需考量侵权人过错程度、受害人痛苦程度等因素。

以下司法案例说明了权利保护的复杂性：某作者开发了“Excel 报表”计算机程序，并将使用权授予一组织。后发现 C 公司未经许可在其搜索引擎中使用了这些程序，且部分程序未标作者姓名或出现故障。作者起诉主张版权侵权。法院以作者已转让专有使用权为由驳回财产权赔偿请求。然而，该判决忽视了人身非财产权的独立保护。被告未经许可使用且未正确署名，可能构成对作者署名权、名誉权的侵害。这表明，即使财产权已转让，作者仍可基于受侵害的人身非财产权寻求司法保护。《法律》第五十五条第 3 款规定，侵害版权及相关权需承担白俄罗斯共和国立法规定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

4. 结论

版权是普遍人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版权权利是智力创作、个人实现及人格尊严的核心保障之一。作为民事立法制度的版权，旨在规制因科学、文学、艺术作品、计算机程序及数据库的创作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民法典》与《法律》确立了知识产权法这一子制度的大部分规则，界定了其适用范围与期限，构建了客体体系，并明确了绝对版权关系的基础与内容。《法律》还包含专门条款，规制因特定类型版权客体（如演绎作品、汇编作品、视听作品、计算机程序、数据库）的创作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法律》第二章对合作作品及职务作品制度的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

总体而言，在评估现行立法并指出需解决的问题时，可明确以下完善方向：更清晰地界定版权及相关权各客体的法律制度；加强对作者及表演者人身非财产权的保护；完善职务作品制度；重新审视版权及相关权客体的合理使用情形；修改并补充规制版权及相关权客体创作与使用合同关系的法律条款；确立细化版权及相关权财产权集体管理程序与方式的规则；更新版权及相关权民事保护的法律条款，包括界定网络环境下版权及相关权侵权责任的特殊性。

综上所述，维护并提升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智力潜力，完善知识产权领域的关系，是社会进一步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 [1] Ав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 и смежные права / И.В.Попов [и др.]; под ред. В.Ф. Чигира. - Минск: Амалфея, 2016. - 560 с.
- [2]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Закон Респ. Беларусь, 30 июня 2023 г., № 274-З : в ред. Закон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от 20 декабря 2014 г. № 213-З // ЭТАЛОН.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 Нац. Центр прав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есп. Беларусь. – Минск, 2025.

- [3] Канторович, Я.А. Ав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узыкальны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и фот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Закон 15 марта 1911 г. / Я.А. Канторович. - СПб. : Право, 2021. - 424 с.
- [4] Закон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Об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й, градостроительной и стро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Беларусь» от 28 июля 2004 г. №300-З в ред. от 28 июня 2024 г. № 15-З (далее - Закон о стро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 ЭТАЛОН.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 Нац. Центр правовой информ. Респ. Беларусь. – Минск, 2025.
- [5] Лосев, С.С. Авторский договор / С.С. Лосев: сб. Ав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 и смежные права. –Мінск: Беларуская навука, 2016. – 316 с.
- [6]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декс Респ. Беларусь : Принят Палато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28 окт. 1998 г. : одобр. Советом Респ. 19 нояб. 1998 г. : текст Кодекса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на 31 дек. 2014 г. в ред.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от 17 февраля 2025 . №°62-З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авовой Интернет-портал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21.02.2025, 2/3148) - внесены изменения и дополнения, вступившие в силу 22 февраля 2025 г., за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изменений и дополн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вступят в силу 22 ноября 2025 г. и 1 января 2026 г. //// ЭТАЛОН.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 Нац. Центр правовой информ. Респ. Беларусь. – Минск, 2025.
- [7] Вишневецкий, Л.М. Формула приоритет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авторского и патентного права / Л.М.Вишневецкий, Б.И.Иванов, Л.Г.Левин. - Л.: Наука, 2017. – 148 с.
- [8] Всемирная конвенц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по вопроса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у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Об авторском праве». Ратифицирована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м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от 07.06.1993 N 370 // // ЭТАЛОН.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 Нац. Центр правовой информ. Респ. Беларусь. – Минск, 2025.
- [9] Судариков, С.А. Основы авторского права / С.А. Судариков. - Минск: Амалфея, 2020. - 512 с.
- [10] Люкшин, А.М. Ав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 на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канд. юрид. наук: 12.00.03 // А.М.Люкшин. - СПб.: СПГУ, 2017. - С. 4.
- [11] Судариков, С.А.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 С.А.Судариков. - Минск : Изд-во деловой и учеб. лит., 2017. - 800 с.
- [12] Дозорцев, В.А.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ые права и их развитие // Права на результаты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Ав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 Патентное право. Други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ые права: сб. норматив. актов / В.А.Дозорцев. - М.: Де-юре, 2018. – 216 с.
- [13] Шершеневич, Г.Ф. Учеб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права. - 8-е изд. / Г.Ф.Шершеневич. - СПб., 2020. - С. 382.
- [14] Об авторском праве и смежных правах : Закон Респ. Беларусь, 9 января 2023г., № 243-З // ЭТАЛОН.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 Нац. Центр правовой информ. Респ. Беларусь. – Минск, 2025.

Research on the Legal Nature of Belarus' Copyright System: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Civil Legislation System

ZHANG Rongyi

(Mogilev State University, Mogilev 212022, Belarus)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rket relations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copyright protec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reators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is paper takes the Civi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and the Law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as the core texts to explore the legal nature of copyright within Belarus' civil legislation system.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pyright legislation, analyzes its position in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system, and points out that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constitute two sub-systems und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which are jointly regulated by the basic law and special laws. It focuses on the subjects and objects of copyright, as well a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s of personal non-property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exclusive rights) enjoyed by author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elarus' copyright system is relatively complete, but it still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refining the right system.

Keywords: Belarus; Copyright; Civil Legislation; Legal Na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家庭资本如何影响“双减”政策响应

郑友刚

(九江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

摘要: 本文从家庭资本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双减”政策响应的内在机制, 并分析其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作用路径。文章深入研究了每个维度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 包括从资源分配到教育选择的逐步传导。同时, 分析了当前家庭资本在政策响应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并提出优化政策落地的机遇, 如加强政策支持、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家庭赋能。通过这些措施, 可以有效提升政策执行效果, 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 家庭资本; 双减政策; 政策响应; 教育公平; 影响机制

0 引言

随着中国“双减”政策的全面实施, 教育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该政策旨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推动教育公平与素质教育发展^[1]。然而, 政策响应在不同家庭间存在显著差异, 家庭资本作为影响教育决策的关键因素, 日益成为研究焦点。家庭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通过资源分配、信息获取和社会网络等途径, 塑造家庭对政策的认知和行为响应^[2]。在“双减”政策背景下, 家庭资本的高低可能导致政策执行效果的极化, 如高资本家庭更易适应政策变化, 而低资本家庭可能面临资源匮乏和选择有限的困境。

本文从家庭资本理论出发, 探讨其如何影响“双减”政策响应。首先, 概述家庭资本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教育中的作用; 其次, 分析“双减”政策的核心内容与目标; 然后, 深入探讨家庭资本三个维度对政策响应的影响机制, 包括经济资本的资源支撑、文化资本的认知引导和社会资本的信息传递; 最后, 总结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通过对家庭资本与政策响应关系的系统分析, 旨在为优化“双减”政策执行、促进教育公平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 家庭资本在“双减”政策响应中的关键作用

家庭资本作为家庭所拥有的资源总和, 在“双减”政策响应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不仅影响家庭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还直接决定其行为调整能力。以下从三个维度分析家庭资本的关键作用。

1.1 提升政策认知与适应能力

家庭资本通过提供经济资源、文化知识和社会联系, 增强家庭对“双减”政策的认知深度和适应速度。例如, 高文化资本家庭通常具备更强的教育信息解读能力, 能够快速理解政策意图, 并调整子女的教育策略, 如减少课外培训依赖, 转向素质教育 activities^[3]。同时, 经济资本充裕的家庭可以投资于替代性教育资源, 如在线课程或兴趣班, 以弥补政策带来的变化, 确保子女教育连续性。这种适应能力不仅降低政策冲击, 还促进家庭与学校的协同, 推动政策落地。

作者简介: 郑友刚 (1985-), 男, 研究生, 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以“教育技术”为核心, 赋能制造业。

1.2 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双减”政策强调减轻负担，但家庭资本差异可能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高资本家庭通过经济投入和社会网络，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如个性化辅导或社区教育项目，从而在政策框架内实现资源优化^[4]。相比之下，低资本家庭可能因资源有限而难以应对，加剧教育不平等。家庭资本的作用在于缓冲政策负面影响，通过内部资源整合，提高教育效率。例如，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可以通过亲友网络共享信息，选择性价比高的教育选项，减少外部依赖。

1.3 增强家庭决策与政策互动

家庭资本提升家庭在政策环境中的决策能力，使其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响应。文化资本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参与学校活动和政策讨论，影响本地教育政策的微调^[5]。经济资本则支持家庭进行长期教育规划，如储蓄教育基金或移民择校，以规避政策限制。此外，社会资本通过人际关系网络，提供政策反馈渠道，帮助家庭表达诉求，形成政策响应的良性循环。这种互动不仅强化政策执行力，还促进家庭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1.4 促进教育公平与包容性发展

家庭资本的合理利用可以弥合政策执行中的差距，推动教育公平。在“双减”背景下，高资本家庭的经验和资源可通过社区共享或政策扶持，扩展至低资本群体，例如通过志愿者活动或数字平台传播教育知识^[6]。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借助家庭资本网络，实施针对性干预，如补贴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从而减少资本差异对政策响应的负面影响，实现包容性教育发展。

2 “双减”政策下家庭资本的影响路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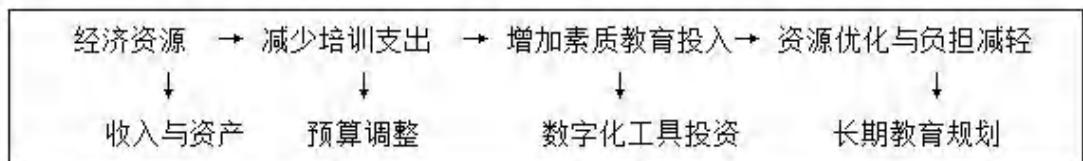
家庭资本对“双减”政策响应的影响路径可以概括为经济资本阶段、文化资本阶段和社会资本阶段（表1）。每个阶段具有特定的作用机制和发展目标，并且随着政策深入和家庭适应，各阶段相互融合，逐步向全面赋能发展。

阶段	关键因素	主要特征	发展目标
经济资本阶段	收入、资产、教育支出	资源分配与基础支持	保障基本教育需求，减少负担压力
文化资本阶段	教育水平、价值观、认知	信息解读与行为引导	增强政策理解，促进素质教育转型
社会资本阶段	社会网络、社区参与	信息共享与互助合作	构建支持体系，提升整体响应效率

表1 家庭资本的影响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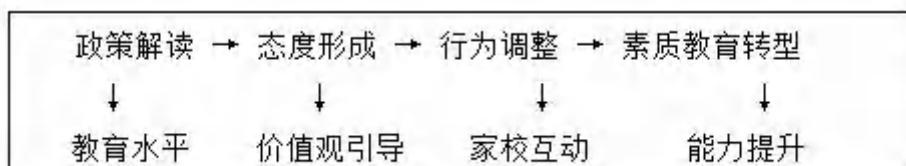
2.1 经济资本阶段的影响路径

经济资本是家庭响应“双减”政策的基础，通过财务资源直接影响教育选择。发展路径如图1所示，首先，家庭通过收入水平和资产状况，决定是否减少校外培训支出，转而增加素质教育投入，如艺术或体育课程^[7]。随着政策推进，家庭需调整预算分配，优先保障子女的学习资源，例如购买教材或参加公益活动。接着，经济资本较高的家庭可能投资于数字化工具，如智能学习设备，以应对学校作业减少后的教育真空。最终，通过资源优化和长期规划，家庭实现教育负担的减轻，并维持子女学业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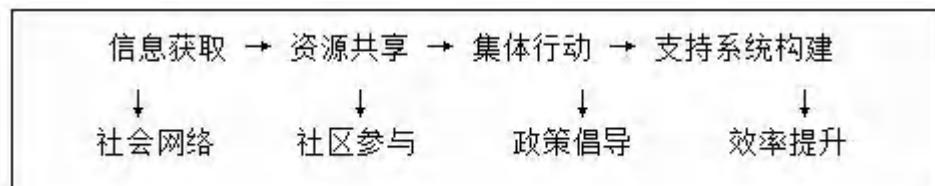
2.2 文化资本阶段的影响路径

文化资本通过家庭的教育背景和价值观，塑造对“双减”政策的认知和行为响应。发展路径如图 2 所示，首先，家庭通过父母教育水平和知识储备，解读政策内容，形成支持或抵制态度^[8]。然后，高文化资本家庭倾向于倡导素质教育，减少学业压力，并通过家庭教育活动，如阅读或讨论，强化子女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文化资本促进家庭与学校的沟通，参与政策反馈，推动本地化调整。最终，通过价值观传递和认知升级，家庭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平稳过渡。



2.3 社会资本阶段的影响路径

社会资本依托家庭的社会网络和社区参与，增强政策响应的协同性。发展路径如图 3 所示，首先，家庭通过亲友、邻居和社区组织，获取政策信息和实践经验，降低信息不对称^[9]。然后，社会资本促进资源共享，例如组织学习小组或社区教育项目，弥补个体资源不足。接着，家庭利用网络影响力，参与政策倡导或反馈，形成集体行动。最终，通过互助合作和网络扩展，家庭构建 robust 的支持系统，提升整体响应效率，并减少政策执行中的社会隔离。



3 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家庭资本在影响“双减”政策响应过程中，既面临诸多挑战，也蕴含发展机遇。分析这

些因素有助于优化政策设计。

3.1 面临的挑战

3.1.1 资源不平等与教育差距

家庭资本分布不均导致政策响应极化，高资本家庭更易适应“双减”要求，而低资本家庭可能因资源匮乏而加剧教育劣势^[10]。例如，经济资本低的家庭难以承担素质教育成本，文化资本低的家庭缺乏政策理解能力，这扩大了教育公平缺口。资源不平等不仅削弱政策效果，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需通过外部干预弥合。

3.1.2 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偏差

“双减”政策信息传播依赖家庭资本，低资本家庭往往获取信息渠道有限，易产生误解或抵制行为^[11]。文化资本不足可能导致政策解读偏差，例如将“减负”误解为“放任”，影响子女教育质量。信息不对称还加剧家庭与学校的沟通障碍，限制政策反馈效率。

3.1.3 社会网络碎片化与支持缺失

社会资本低的家庭通常缺乏紧密社区网络，难以获得外部支持，在政策响应中处于孤立状态^[12]。例如，单亲家庭或农村家庭可能无法通过社会资本获取替代教育资源，增加政策适应难度。网络碎片化还削弱集体行动能力，导致政策执行在基层受阻。

3.1.4 政策执行中的制度障碍

当前“双减”政策执行中，制度设计未充分考量家庭资本差异，例如补贴机制不完善或社区服务覆盖不足^[13]。这使低资本家庭在响应政策时面临额外成本，如时间投入或机会损失，制约政策普惠性。

3.2 发展机遇

3.2.1 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

政府正加大对“双减”政策的配套支持，如财政补贴、教育公共服务扩展和家庭赋能项目^[14]。通过针对性政策，低资本家庭可以获得经济援助或信息指导，减少资本差异的影响。例如，各地推出的“课后服务”计划，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辅导，增强政策响应能力。

3.2.2 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普及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家庭可通过数字平台获取政策信息和教育资源，降低资本门槛^[15]。例如，在线教育APP和社区微信群传播“双减”知识，帮助低文化资本家庭改善认知。数字化转型还促进数据共享，使政策制定者能实时监测家庭响应，优化干预措施。

3.2.3 社区建设与社会资本培育

通过加强社区教育和网络建设，家庭社会资本得到提升，形成互助生态系统^[16]。例如，社区中心组织家长工作坊，分享政策响应经验，增强集体适应能力。社会资本培育不仅改善个体响应，还推动整体教育环境的优化。

3.2.4 教育创新与素质教育推进

“双减”政策鼓励教育模式创新，如项目式学习或生涯规划，为家庭资本赋能提供新途径^[17]。高资本家庭的经验可转化为示范案例，通过媒体或学校推广，引导全社会转向素质教育。这不仅提升政策响应质量，还促进长期教育发展。

4 结语

随着“双减”政策的深入实施，家庭资本在政策响应中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影响教育公平与效果的核心变量。本文通过对家庭资本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的分析，揭示了其影响政策响应的内在路径。从资源分配到行为调整，再到社会互动，家庭资本逐步传导政策效应，推动教育生态优化。

然而,家庭资本差异也带来挑战,如资源不平等、信息不对称和社会网络碎片化,可能加剧教育差距。为应对这些挑战,应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社区建设,通过资源倾斜和家庭赋能,缩小资本差距。同时,借助教育创新和素质教育推进,家庭资本可以与政策形成良性互动,提升整体响应效率。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家庭资本与政策执行的动态关系,为中国特色教育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刘红, 张伟. “双减”政策背景下家庭教育负担变化研究[J]. 教育研究, 2023, 44(2): 56-67.
- [2] 陈静, 李华. 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 理论与实证[J]. 社会学研究, 2022, 39(3): 78-90.
- [3] 王磊, 赵芳. 文化资本对“双减”政策响应的影响分析[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 45(1): 102-110.
- [4] 孙明, 周涛. 经济资本与教育资源分配的关系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22, 41(4): 123-135.
- [5] 李娜, 刘洋. 社会资本在教育政策执行中的作用[J]. 教育发展研究, 2023, 43(5): 88-97.
- [6] 张强, 王芳. 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双减”政策优化路径[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 38(6): 45-56.
- [7] 赵琳, 陈凯. 家庭经济资本对校外培训减少的响应机制[J]. 财经研究, 2023, 49(2): 134-145.
- [8] 刘丹, 杨光. 文化资本与家庭教育决策: 基于“双减”政策的实证[J]. 心理科学, 2022, 45(3): 67-78.
- [9] 周伟, 黄敏. 社会网络与政策信息传播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 50(1): 112-124.
- [10] 王芳, 李强. 教育资源不平等与“双减”政策挑战[J]. 教育学报, 2022, 40(4): 89-101.
- [11] 陈浩, 张丽. 信息不对称对政策响应的影响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 20(2): 156-168.
- [12] 杨静, 刘伟. 社会资本碎片化与教育支持缺失[J]. 社会学评论, 2022, 39(5): 144-155.
- [13] 李华, 王磊. “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制度障碍与对策[J]. 教育政策研究, 2023, 44(3): 77-89.
- [14] 张伟, 陈静. 政府支持与家庭赋能政策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 38(7): 102-113.
- [15] 赵芳, 孙明. 数字化转型对教育政策响应的影响[J]. 电化教育研究, 2023, 44(6): 134-145.
- [16] 刘洋, 李娜. 社区建设与社会资本培育路径[J]. 社会建设, 2022, 39(4): 67-78.
- [17] 周涛, 张强. 教育创新与“双减”政策推进[J]. 教育探索, 2023, 45(2): 112-123.

How Family Capital Influences Responses to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ZHENG Yougang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 Jiangxi 332005i,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how family capital influences the response to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It analyzes th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resource allocation, educational choices, and policy adaptation. The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key factors and their effects at each stage, including the gradual transmission from basic resource distribution to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main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in policy response and proposes opportunities for optimiz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such as enhancing policy support,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ity, advanc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owering families. Through the effective use of these measures, it is possible to improve policy execution,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nhance overall education quality.

Keywords: family capital;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olicy response; educational equity; influence mechanism

情之所至，理之所归：《董生与李氏》中的三重变

蒯仁君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本文以梨园戏经典剧目《董生与李氏》为深度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与戏剧叙事学分析，揭示该剧作以“情欲觉醒-礼教冲突-人性解放”为隐性叙事脉络，在保持市井喜剧趣味的同时，实现了对封建伦理的批判性重构。研究发现，剧中董四畏从“畏礼畏法”的儒生到“冲破礼教”的勇者之蜕变，既是个体情感力量突破理性规训的典型呈现，更是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人文意识觉醒的艺术投射。该剧通过“才子佳人”模式的解构与重构，在情理交锋的戏剧张力中，完成了对传统道德伦理的现代性反思，为古典戏剧的当代转化提供了重要范本。其创新价值在于，将市井喜剧的娱乐功能与人文批判的思想深度有机统一，开创了古典戏剧“以情载理”的新范式。

关键词：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情感解放；礼教批判；人文觉醒

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以“情”为剧情发展的核心，董四畏从胆小老实的读书人到敢与鬼魂叫板的董不畏，与李氏之间迅猛而热烈的爱情是这一变化不可或缺的推动力。这样的情节设计是对市井趣味的迎合，亦是让简易布置的舞台足以焕发光彩的关键，作品中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灵动有趣的人物对话和恰到好处的喜剧技巧，都使此作品从一众言情故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精彩绝妙的戏剧文本，甚至堪当古典戏剧传承的代表之作。以情的变化为主要线索进行分析，可以窥见二人间的情感碰撞既是董四畏这一角色转变的见证，也是作品主旨得以借助唱词和文本作为表达路劲的关键。

一、情之变：市井趣味与艺术表达的巧妙结合

当董四畏与李氏反复拉扯时，作品中颇具趣味的唱词无形间消解了董四畏心底里挣扎的这一严肃性。董四畏身上既有彭员外的嘱托，也是读书人克己的传统，还带着对自己身份和年纪的自卑，所有的一切都在要求着他应当克制自己心底里的欲望。这种对于人性欲望的深刻探讨于市井趣味的梨园戏而言难免有些不符调性，因而作品中大量的喜剧技巧、节奏把控等，都在刻意把这个严肃的问题留为剧情进展中一个普通的小阻碍，让这份艺术表达不破坏市井趣味的呈现。彭员外没有明显的权势压人，反倒是听完董四畏正义凛然的成词来了句“吾正喜听你这一席话，此事更非董兄莫属”^①，颇有一种白费口舌的荒唐感；再有便是梅香的各种古怪行为和言语，诸如“一日吃三顿，百事皆不问。”，看到李氏赏月来一句“也不是中秋，也不是初二、十六”等。与此同时，整部剧所选用的是古典戏剧中常见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夏豫宁学者将“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总结了一种固定套路：“邂逅相逢，一见钟情；小人拨乱，历经磨难；终成眷属，团圆结局”。^②这一叙事模式自唐传奇始，将情感置于首位，指向对纯情的赞美，这样上天安排解决人生大事的巧合满足了封建时期市井民众的精神渴求。

作者简介：蒯仁君（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① 王仁杰.董生与李氏[J].戏剧文学,2013,(10):23.

② 夏豫宁.论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当代嬗变[J].扬子江评论,2018,(05):92.

纵观俗文学历史，“才子佳人”的剧情模式虽非《董生与李氏》首创，但却属于同模式创作下不可多得的一个优秀剧作。从情节上看，董生心生情愫的情节有对《牡丹亭》的模仿痕迹：以一首诗为引子，董生忽而在李氏的身上找寻到了对这首诗的理解，转而带来了内心“情”的觉醒。^③从人设上看，“才子”董四畏颇有学识，能在当地成为一个教书先生，名声和人品也可以讨到一声好，但他既不是达官显贵之家，也没能金榜题名改变人生，是这个模式中怀才不遇或尚未遇见人生转机的男主；“佳人”李氏貌美如花，彭员外哪怕身亡后也要专门想办法延续一刻钟寿命不让这李氏从了他人，李氏面对有心却举棋不定的董四畏大胆上阵，是这个模式中常见的，以美貌让才子动容，再以自己行动感化才子之人。《董生与李氏》并非是完全的“才子佳人”命题创作，它保留了最让观众喜欢的情感互动，包括李氏放下珠帘留一倩影给学堂里的董四畏，吩咐梅香送榴莲（流连）暗示，知董四畏正登墙窥视于是吟唱元人小令等，“这种调情方式是我们可以接受甚至认可的，符合市民阶层审美情趣的，又不太违背文人道德的底线。”^④在此基础上做了些许的改变，才子与佳人间爱情的阻碍不止于传统的才子尚有要事在身（如上京赶考）、女子空守闺房、情敌从中阻拦等，而加入了董四畏自己内心的挣扎。

叙事艺术的一种魅力在于让故事的发展随着自己的节奏来完成想要的表达，这份表达有时极其脱离现实，却能让观众代入而误以为这是现实。董生这一人物形象的转变是有些许脱离现实的，彭员外还没说嘱托之事单说烧他借据，他的下意识回答是“岂不陷吾于不信不义”；当彭员外故意把任务说得无需负担，即只需观察对方行为，有情况则坟前相报就行，他却可以瞬间意识到这分明是“鸡鸣狗盗”“煮鹤烹琴”^⑤之事。吊诡的是，这般坚持原则的董生却莫名心软答应此事，只为彭员外能安心合眼，再后来心中对李氏燃起的情甚至足以让他半推半就落入李氏安排好的陷阱。但这样的发展却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当彭员外死不瞑目，董生无奈接下请求让他安息瞑目，一种荒诞的喜剧效果得以展现，虽然离奇但观众很容易就意识到这是在促成男女主的见面。董四畏为了李氏，突然就有了敢与天斗的爱情过于不合乎常理，但情感戏中无论是董生因为犹豫彷徨而出了洋相，还是李氏大胆靠近对方，这些都是极具吸引力的片段，如同今日霸总小说、御姐小说一般，一旦观众被这个片段吸引住，折服于浪漫的场面，表面含蓄隐晦实则大胆奔放的对话时，只是带着满足些市井小民趣味的期待的观众就足够去相信这其中的爱情。至于董四畏为何会为这突如其来的艳遇而变得勇敢也就不在被人多加在意了，观众相信了这段爱情的美好，就可以接受董四畏要为这份爱情去做些什么，剧情的后续发展就有了更多可能，接下来以此为表层动机，实则是为了符合作品主旨的表达来安排人物行动，也不会显得生硬，破坏观众的欣赏体验了。

二、人之变：董生的人物成长及其思想转变

全剧中，李氏、梅香、彭员外等人皆性格鲜明，人物特点从一而终。人物性格的生动鲜明是戏剧得以展现众生相的一大关键，也可以极大减少剧情发展的解释成本。《董生与李氏》凭借人物对话就刻画出了形形色色的角色，包括极富“打工人”样态的小鬼，古灵精怪的梅香，尚带些懵懂无知的学童与小锣师等，故事在这些性格各异的人身上展开，碰撞出奇妙火花的同时，也更加突出了董生的成长与变化。董生是戏中唯一具有成长属性的角色，前后对比明显，其心态转变亦是成就这段爱情的关键所在。董生的人物形象刻画有其深刻内涵蕴藏其中，他是思想举止为传统礼法限制的读书人，也是被彭员外随手捏住的底层人，还是被李氏和梅

③ 陈杰. 现代戏曲叙事的当代演进——以《董生与李氏》《节妇吟》对“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袭用和嬗变为例[J]. 戏剧文学, 2025, (02): 63.

④ 黄文娟. 论梨园戏小梨园的市井文人价值取向——以《陈三五娘》《董生与李氏》为例[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05): 103.

⑤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 23.

香三言两语就哑了声的老实人，每一幕看似寻常的对话都在进一步有效塑形这个角色，“这等可信、可亲、趣味与韵味兼备、诗格与品格相融的个性刻画和心理描写，即便在当代一等一的戏剧文学大家作品中也很少见到。”^⑥当董四畏娶到美人李氏，是对市井趣味的满足，也是一种反抗的象征，他既要反抗心底那些莫名束缚着自己的思想枷锁，也要反抗彭员外这样压制普通百姓的封建传统。

董四畏的成长不只在于自身的敢于反抗，同时也是认清了所有人都不该被世道无情之事所压迫。“忠于传统理性道德的呆气文人董四畏（董生）在受命执著于监察新寡李氏贞操品行的过程中，面对异性青春艳丽及生命盎然的灵动与荡漾不禁怦然心动，生命中最激越、最本质、最强悍的人性波澜随即汹涌澎湃起来。”^⑦这样的情节设计，与网文中单纯女孩吸引霸总、活泼女孩改变男子冷漠面庞、温柔弟弟打动孤独女总裁等剧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的改变太过于复杂，因为爱情而变得平易近人成为了证明情感真挚且影响巨大的一种表现和证明。有所不同的是，董四畏突破的还有对贞洁的成见，他大胆发问“你撒手西去，留下夫人，留下夫人为你守活寡，一旦有差池，更以刀剑相加，你仁乎？”^⑧第五幕“坟前舌战”是董生完成转变的一幕，彭员外能率先占理是观众意料之中，剧情推动至此，李氏不守贞洁，受托监督的董生还监守自盗的在董四畏自己的心理活动中反复出现，彭员外几乎不费口舌就能有理而声高。然而随着彭员外步步相逼，董四畏终究不再畏首畏尾，董生发现了自己既与李氏两厢情愿，分明才是真正合乎礼义信之人，现在竟然深陷他人礼法之外的说辞之中，在董生的反问中这部戏迎来了真相的叩问，撒手西去之人却要限制生者自由，“一旦有差池，更以刀剑相加”^⑨为不仁，不侍人却要侍鬼为不智，阻拦两情相悦的眷侣为不礼、不义、不信，

李氏没有义务为她守下贞洁，她有自己追求爱情的自由，董四畏无需再以自己爱对方为缘由渴望解脱，他可以大胆自信讲出自己才当时站在公序良俗的一方。从一开始董四畏遭受的就是他人制造的道德困境，而突破这一困境的上上策是思想上的解放，如居其宏教授所言，“董生斥鬼之论，实实是说给某些活人听的，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俨然是一篇警世箴言。”

董生的转变如果从本我、自我、超我来进行分析，则他的成长变化并非突兀转折，反而有迹可循。最初的董生不仅思想封建而且性格懦弱，或是来自债务压身的苦，也或是彭员外的死不瞑目让他自己也不踏实，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他答应了彭员外的要求，即使在他自己看来荒唐至极，不合礼数。后来纵使超我在不断约束董生非礼勿视，不可过分关注，他也依然一步步沦陷进了李氏设下的圈套，当翻墙而入，李氏稍加引诱便燃起了他心底的欲火。尽管本意上是为了观察李氏的状态，却翻墙误入陷阱被李氏吸引，董生对李氏“从监视和被监视的关系，转变为异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是作者关于人皆有内心之情的理念表达，此情会被深藏于心但终有一日为自己所察觉，这是“感情胜过理性、人之常情胜过道德伦理的表现”^⑩。“儒家道统的基本德目之一便是守‘礼’。‘礼’是儒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经过‘礼’的检视。”^⑪圣人、君子的人格理想则塑造着这些读书人的超我。

“坚持君子的身份和立场便成为统御董生超我世界的核心内容。君子的身份限定了董生的行为模式。作君子就要克己复礼，要恭敬谦让，要诚信和顺。”^⑫在数年未能入仕的日子

⑥ 居其宏. 由“四畏”到“不畏”的人生涅槃看梨园戏《董生与李氏》[J]. 中国戏剧, 2020, (09): 30.

⑦ 卢昂. 将传统带进现代——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导演手记[J]. 戏剧文学, 2013, (10): 40.

⑧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 31.

⑨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 31.

⑩ 陈杰. 现代戏曲叙事的当代演进——以《董生与李氏》《节妇吟》对“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袭用和嬗变为例[J]. 戏剧文学, 2025, (02): 65.

⑪ 谷容林. 中国古代文人自我复归的心理生存机制——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中董生的心理分析[J]. 四川戏剧, 2006, (01): 73.

⑫ 谷容林. 中国古代文人自我复归的心理生存机制——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中董生的心理分析[J]. 四川戏剧, 2006, (01): 73.

里，董生的自我始终没有完成自己心中的理想，他便一直以接近超我的状态束缚着自己，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董四畏”。就这般让超我压抑着本我的董四畏，自我选择压抑最原始的爱欲和任何有失礼节的想法，所以与李氏初遇时，他被梅香“读书人不去做官，却来做跟随，好无志气！”^⑬说得哑口无言，说到底他心里也清楚这一离奇的嘱托让他难以自己的人格做辩护。好在董生的转变不是行动上的被驱赶前进，而是思想上也真正认识到了解放与反抗，不再被超我严加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到了该去交差之时，董生面对眼前心爱之人李氏的恳求，他明白这件事不该是自己的错，从一开始不管是不让李氏找嫁与他人，还是让自己一个读书人行此偷窥之事，都是不合乎真正道义的。他不再黯然接受惩罚，而是直面彭员外这一鬼魂的威胁。此前的董生是被礼数压抑的受迫害者，彼时他有了不论如何都要与对方抗战到底的勇气，再不会一味妥协。

三、时之变：情的解放与理的进步

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到20世纪后期，遵照原有设定与套路下却出现了与古典才子佳人小说完全大相径庭的创作，夏豫宁学者将其总结为一种“置换变形”。贾平凹、格非、徐坤等作家创设出一个才子与一个佳人的邂逅相遇，然后历经各种磨难，然而不仅相遇的过程变得格外开放，灵与肉的相容兼而有之，磨难也不再是了让爱情更加坚定，相反开始直击人心，叩问人性，直至结尾悲剧意识置换了古典小说的圆满意识。^⑭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玛丽苏文学和霸总小说将原有的才子佳人做了更高维度的升级，设定上霸总（才子）和女主（佳人）必定会一见钟情，但更重要的不是两人心里的情有多重而是要侧重于二者在旁人看来有多么般配，或是门当配对棋逢对手，或是佳人的美貌与性格能像才子的财富地位一般在众人中脱颖而出，极具亮眼；接下来的磨难不只是为了让二人的关系更进一步，也是为了一遍遍突出才子与佳人入设，有的才子只手遮天，天下没有不能摆平之事，有的佳人则是善良总能换来令人意外的好运，其创作底层思路便是反复制造新的为了爱情战胜困难的剧情，向观众展现这样几乎完全脱离现实的浪漫与舒畅感。在故事的结尾，才子佳人终于战胜了所有与自己处在对立关系的人，两个人无论爱情，还是事业都不再有足以威胁二人的存在。可以说，这一叙事模式直至今日依旧能够和更多的现实元素相结合，开创出全新剧情。

长久以来，我国文学创作不乏明写男女之事实为其它议题的写作表达，《董生与李氏》剧情发展以情欲间的解放为表象的脉络，亦可从中窥见作者对道德伦理的思考。董四畏是一个老实人，老实到即使知道彭员外之举不合常理，不合礼数，却在外债和彭员外死不瞑目的压力下还是答应了下来，老实到每一步冒犯之举都要在心里默默给自己想清楚许久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当他翻墙而入，最终还是与李氏缠绵悱恻时，他接受了自己心里确实对这位女子是有情的，后面的故事里他看似是为爱献身，其实是终于想通了自己过往的那些压力和无措不过是陷入了自己给自己设下的牢笼，从头至尾他无需为自己的真情流露，为自己的坚守原则付出不该有的代价，于是他并没有喊出爱情自由，反而是说“若非他辱我千年道统，肆意曲谤圣贤书，欲加害夫人你，学生一时也无言以对。”^⑮他以道义驳斥了对方，无需冠冕堂皇，更无须商量求全。这般写作之下人物的成长也不再局限于情爱的突破，更有了内心的丰满。如学者黄文娟所评价的，“它描绘了市民日常的功利欲望与文人价值理想的并置、冲突与协调，及由此显现出来的社会中下层生活的含混、复杂与活泼的生命力。”^⑯一如《雨巷》中丁香一般的姑娘，是一眼结缘然后思念无声的美好，也是心怀理想然后反复追寻的坚

^⑬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24.

^⑭ 夏豫宁. 论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当代嬗变[J]. 扬子江评论, 2018, (05):94.

^⑮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31.

^⑯ 黄文娟. 论梨园戏小梨园的市井文人价值取向——以《陈三五娘》《董生与李氏》为例[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05):100.

定,由此当“我”再次希望飘过这个姑娘时,既是一种点到为止不明说思恋的朦胧美,也是一种对理想实现的渴望。《董生与李氏》或是考虑到梨园戏对市井趣味的满足,故而没有将道德伦理的思考埋成暗线,董四畏与彭员外前后对话间的不同,是其成长与变化的直接表现,也是作者借人物之口做出的直接价值表达。

董四畏与李氏迎来令人拍手叫好的结局,是情欲得以解放,李氏无需为了所谓贞洁而给彭员外守活寡,董四畏不再“畏妇人”也突破了自己面对爱情不敢往前迈出一步的门槛,二人间也在打破传统“才子佳人”中年龄适配,结尾时要想办法让二人地位上门当户对的固定套路。伴随而来的也是理的进步,不论是彭员外的威胁,还是董四畏心里的成见,归根结底这些都不是物质上的阻拦,而皆为根植于思想中的禁锢,他们从心底改变了过去的陈旧观念,方才迎来了新生。这样看来,董生最终的成长是本我、自我与超我走向了和谐统一。到第三幕时,董四畏上墙之前有一长段的独角戏,皆是他的内心纠结犹豫,戏本巧妙利用唱白和念白来形成对话,当念白在纠结怎么看和确认自己看的理由时,唱白则直接“遮得秀才满面羞”“更哪堪亭亭玉立佳人影”揭示董四畏心中已经升起的情愫,也为第四幕李氏能够成功引诱,激发董生本我,使他“欲进无胆,欲退却不能”^⑪做下铺垫。至此,本我被激发,不再完全被超我压抑,董四畏的本我得以展现自己的力量。这个力量在最终与彭员外的对决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超我还是让他第一反应低头认错,然而彭员外欺人太甚,本我决心要“冲冠一怒为红颜”,值得注意的是,本我的发挥并不是靠压倒与放弃超我,相反董四畏是以仁义礼智信的道理回击和正名,本我的欲望激起他真正认识到了一味迂阔封闭不是所谓的思想高尚,反而人人得以遵从本心亦是一种德,董生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到了和谐统一相处的地步。董生与李氏二人形成了直接而强烈的对比,李氏的觉醒比董生要早一些,她是董生的心上人也是这条路上的引导者。彭员外的坏和贪婪潜藏在戏文的寥寥几笔之中,他对李氏明明只是贪图美色,却即使死后都想要拉着李氏和自己一起当个亡命鸳鸯,若不是地府无法强制绑定二人他也不会出了个死魂不放过生灵的下策。无论是观众的眼中,还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来看,这都是令人咋舌的,他对李氏是生前长达三年的占有,和死后也不消散的监督。文本中没有明确说明李氏何时觉醒,但她主动下套诱董四畏翻墙入院,比起董四畏不断压抑心中不断升腾而起的欲望,她敢爱敢恨亦敢作敢当,作品“通过她们对封建夫权、传统伦理和皇权的反抗,将被异化而扭曲的人性拉回到正常的人之常情和自然人性。”^⑫即使到了该面见彭员外的日子,李氏也是那个敢先一步来到坟前的人,面对到来的责罚亦敢代董生受罚。相比起董生,李氏在向世人证明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亦有自己的魅力,女子亦可大胆追求自己所爱,成为在明事理的道路上领头的人。

四、结语

情戏在整个中华传统戏曲中颇为常见,“才子佳人”更是长久以来被众多作家使用的剧情模式。得以继承而来,其最直接的优势就在于足以满足市井趣味,直至今日,我们依旧可以在各类网络文学中窥见其影子。与此同时,不论辩论家、学者、文士等人关于人欲和人性的讨论如何演变,情爱在俗文学的创作里被认为总是一种值得向往的美好,它也常被拿来成为状写他物的喻体。《董生与李氏》沿着这一脉络做出了新的尝试,才子和佳人的阻碍不是门不当户不对,才子最终没有交代是否高中状元,佳人的核心特征不再是善良好心。尽管最后董生大胆反抗那些压抑在他身上的陈旧观念是戏文的高光,但作者没有让这段价值表达压过情感的自由开放,而是选择了一种双线交织并行的叙事,情与理不能单独抽出成为独立完整的成长线,二者本就是生活各自常见的事,一个人的成长也注定会经历来自情和理的共同

^⑪ 王仁杰.董生与李氏[J].戏剧文学,2013,(10):26-28.

^⑫ 陈杰.现代戏曲叙事的当代演进——以《董生与李氏》《节妇吟》对“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袭用和嬗变为例[J].戏剧文学,2025,(02):62.

影响，彼此间可能完全契合，也可能毫不相关，甚至会隐约间有些相悖，但也正是在不同的矛盾之中塑造了各色的人，这个戏文正以董生为主要作用对象，依此来完成的情与理的双线并行，实现这个复杂而精彩的艺术表达。

参考文献：

- [1]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 23.
- [2] 夏豫宁. 论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当代嬗变[J]. 扬子江评论, 2018, (05): 92.
- [3] 陈杰. 现代戏曲叙事的当代演进——以《董生与李氏》《节妇吟》对“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袭用和嬗变为例[J]. 戏剧文学, 2025, (02): 63.
- [4] 黄文娟. 论梨园戏小梨园的市井文人价值取向——以《陈三五娘》《董生与李氏》为例[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05): 103.
- [5] 居其宏. 由“四畏”到“不畏”的人生涅槃看梨园戏《董生与李氏》[J]. 中国戏剧, 2020, (09): 30.
- [6] 卢昂. 将传统带进现代——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导演手记[J]. 戏剧文学, 2013, (10): 40.
- [7]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 31.
- [8]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 31.
- [9] 陈杰. 现代戏曲叙事的当代演进——以《董生与李氏》《节妇吟》对“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袭用和嬗变为例[J]. 戏剧文学, 2025, (02): 65.
- [10] 谷容林. 中国古代文人自我复归的心理生存机制——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中董生的心理分析[J]. 四川戏剧, 2006, (01): 73.
- [11] 谷容林. 中国古代文人自我复归的心理生存机制——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中董生的心理分析[J]. 四川戏剧, 2006, (01): 73.
- [12]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 24.
- [13] 夏豫宁. 论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当代嬗变[J]. 扬子江评论, 2018, (05): 94.
- [14]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 31.
- [15] 黄文娟. 论梨园戏小梨园的市井文人价值取向——以《陈三五娘》《董生与李氏》为例[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05): 100.
- [16] 王仁杰. 董生与李氏[J]. 戏剧文学, 2013, (10): 26-28.
- [17] 陈杰. 现代戏曲叙事的当代演进——以《董生与李氏》《节妇吟》对“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袭用和嬗变为例[J]. 戏剧文学, 2025, (02): 62.

Where Passion Leads, Reason Returns: The Triple Transformations in Dong Sheng and Li Shi

KUAI Renju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Dong Sheng and Li Shi, a classic play of Liyuan Opera, as the in-depth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close text reading and dramatic narratology analysis, it reveals that the play takes "awakening of passion and desire - conflict with Confucian ethics - liberation of human nature" as its implicit narrative thread. While maintaining the entertaining nature of a marketplace comedy, it realizes the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feudal eth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ng Siwei in the play—from a Confucian scholar "afraid of ethics and laws" to a brave man "breaking through Confucian ethics"—is not only a typical manifestation of individual emotional strength breaking through rational discipline, but also an artistic projection of the awakening of humanistic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citizen class in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By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talented scholar and beautiful lady" model, the play completes a modern reflection on traditional moral ethics amid the dramatic tension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passion and reason, providing an important model for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al dramas. Its innovative value lies i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entertaining function of marketplace comedies and the ideological depth of humanistic criticism, pioneering a new paradigm of "conveying reason through passion" in classical dramas.

Keywords: Liyuan Opera; Dong Sheng and Li Shi; emotional liberation; criticism of Confucian ethics; humanistic awakening



环球未来出版社
Global Future Press

一家以国际化视野与前瞻理念著称的高端出版机构，肩负知识与文明传播的使命，致力于引领学术与文化的未来发展。出版社秉持“传播知识、服务学术、连接未来、承载文明”的理念，出版范围涵盖多个领域，打造跨学科、跨地域、跨文化的未来灯塔。出版社以严谨与卓越为根基，全面遵循国际出版规范与同行评审机制，确保成果具备原创价值与全球公信力。对接世界主流数据库，赋予学者学术可见度与世界影响力。依托国际化编委与顾问团队，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学术服务体系。

www.gfpress.org

权责声明

本刊所刊载的文章及观点均由作者独立撰写并承担相应责任，不代表本刊及本社的立场或意见。文章内容的合法性、学术性及可行性均由作者本人负责，文中引用的资料、数据及观点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亦由作者独立保证。本社严格遵循学术出版规范，坚决反对抄袭、剽窃、数据假和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一经发现，本刊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撤稿、标注声明等处理措施并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文章一经刊用，出版社依法享有其出版、传播及数据库收录等相关权利。未经本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本刊内容；在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范围内的引用，应注明作者及来源，不得歪曲、篡改。本刊出版仅用于学术交流与信息参考，不构成任何商业或法律保证；因使用相关内容所引发的直接或间接后果，本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学术赠阅 | 研读参考



关注官微 | 更多资讯